

## 閱讀姚瑩為臺入獄詩的幾個視角

廖美玉\*

### 提 要

姚瑩官臺期間長達十餘年，又逢西方國家全力拓展海外市場的年代，使臺灣由海外孤島變成野心家的必爭之地。做為地方官員，姚瑩為臺灣所作的種種規畫與策略，都能清楚標示出海洋空間與島嶼特性，同時他也是第一位為臺灣入獄的詩人。為了更貼近地閱讀姚瑩為臺入獄詩，本文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討姚瑩如何為臺灣發聲，把臺灣的人民與土地鐫刻到許多人的印象裡，從而在一個重新描繪「世界地圖」的年代，臺灣也正由邊鄙向前哨的位置移動時，錨定守土護民的臺灣主體性，即使置身天威難測與權要伎功的雙重風暴中，依然全心全力固守地方官員的位置，由此開啟閱讀姚瑩為保臺抗英而遭讒入獄的多元視角。第二部分以姚瑩遭革職逮問後的詩人書寫，由詩／文兩種文類的書寫差異切入，分別從「主政者在舉才與斷獄上的明辨」、「臺灣之獄所關涉的公／私領域」與「由官民命運共同體到臺灣觀點的浮現」三方面加以論析。

關鍵詞：姚瑩、臺灣之獄、臺灣觀點、詩人書寫、閱讀視角

## The Various Viewpoints of Yao Ying's Jail-period Poems

---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Liao Mei-Y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Abstract**

Yao Ying was a government official in Taiwan for more than 10 years. That time was the year when western countries expanded their markets towards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is made Taiwan from an isolated island to important area by ambitious politicians. As a local official, Yao Ying made several plans and devices which clarified the oceans surrounding Taiwan and the characters of the island.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the first poet sentenced to jail. In order to read Yao Ying's jail-period poems as detailed as possible, this article is separat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discusses how Yao Ying raised his voice on behalf of Taiwan. Because of him, Taiwan's land and people were recognized. In the age of redefining the "World Map," the position of Taiwan was improved. A goal where the protection of land and people was consider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was set. In the middle of a stormy and chaotic situation, he still wholeheartedly defended his position as a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 From this moment on we can read Yao Ying's poem from various viewpoints on the protection of Taiwan against England, on which he was sentenced to jail. The second part focuses on the poems and articles from the period when he lost his official position and was arrested,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kinds of literature texts. We will discuss it at three different parts. Firstly, "The distinguishing between selecting talent and stopping jail by a government official" and, Secondly, "Public and private parts of jails in Taiwan". The last part is "From the common fate of officials and the people to the appearance of Taiwan's point of view."

**Keywords: Yao Ying, Taiwan's jail, Taiwan's point of view, Reading viewpoint, Poet's writings**

# 閱讀姚瑩為臺入獄詩的幾個視角

廖美玉

## 一、前言

姚瑩，字石甫，號明叔，晚號展和，以「十幸」名齋，又號幸翁。安徽桐城人。生於乾隆五十年（1785），卒於咸豐二年十二月十六日（1853），歷經乾隆、嘉慶、道光、咸豐諸帝，享年六十八。從祖姚鼐（1731-1815）為桐城派古文創始人之一，論學以考證佐義理、茂辭章，宗宋儒，強調心要能夠宏通明澈，文必須「博學強識而善言德行」<sup>1</sup>。姚瑩少從姚鼐學，博覽群籍，洞達世務，志在經世，指陳時事利病，慷慨深切。嘉慶十三年（1808）進士，生平仕宦全為地方官，足跡集中在南方，包括福建平和縣、福建龍溪、臺灣噶瑪蘭、臺灣雞籠、四川、廣西、湖南，卒於湖南。著有《中復堂全集》，其中《東槎紀略》、《東溟奏稿》、《臺北道里記》、《噶瑪蘭紀略》、《埔里社紀略》、《東西勢社蕃記》為研究臺灣的重要史料<sup>2</sup>。

姚瑩與臺灣的關係，始於嘉慶二十四年（1819）調任臺灣知縣，旋署南路海防同知。道光元年（1821）移署噶瑪蘭通判，對宜蘭早期的開拓著力甚多<sup>3</sup>，卻以龍溪

<sup>1</sup> 見姚鼐《惜抱軒文集》卷四〈述菴文鈔序〉，文中強調義理、考證、文章三者兼具，以為文之佳者應「議論考覈，甚辨而不煩，極博而不蕪，精到而意不至於竭盡。」（頁 61）其〈謝蘊山詩集序〉更直言「士之病」乃：「矜考據者每窒於文詞，美才藻者或疏於稽古。」（頁 55）可見辭章必須建立在考據與義理的基礎上，而為經學者所貴在心的「宏通明徹，不受障蔽」。詳見《惜抱軒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1）

<sup>2</sup> 姚瑩著作極為豐富，《中復堂全集》共有九十八卷（清同治六年八月刊本。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重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所出版之臺灣文獻叢刊收有《中復堂選集》（臺北，1960）。此外，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有《臺灣文獻叢刊》電子資料庫可供檢索。本文有關姚瑩生平，主要依據為姚濬昌撰《姚瑩年譜》（臺灣文獻叢刊第八三冊《中復堂選集目錄》附錄二，頁 231-262）、施立業《姚瑩年譜》（安徽：黃山出版社，2004.11）

<sup>3</sup> 噶瑪蘭即宜蘭舊名，先住民以平埔族中的噶瑪蘭族（Kavalan）為多，1796年才有漢人大量的移

別案遭忌罷職<sup>4</sup>。道光三年（1823）至道光五年（1825），應臺灣府方傳穉之邀渡海襄助<sup>5</sup>。道光十八年（1838）擢臺灣兵備道<sup>6</sup>，時英軍於浙閩一帶攻無不克，惟獨五犯臺灣皆遭挫敗<sup>7</sup>，清帝大喜，特賜花翎，兼二品冠服，蔭一子雲騎尉，以旌其功。南京和議成，姚瑩遭誣陷以「冒功」罪，於道光二十三年（五十九歲）正月二十六日遭革職拏問，三月渡海，五月自福州北上，八月十三日入刑部獄，八月二十五日出獄。總計姚瑩在臺十餘年，洞悉臺灣地勢民情，臺南市大天后宮仍有姚瑩所題對聯：

皇清贊順安瀾，八百載神功廣運，歷宋元明以翊。

天后宏仁利濟，億萬祀聖德長昭，統江河海咸尊。

道光二十（一八四〇）年庚子正月吉旦，按察使銜臺澎道兼學政姚瑩敬撰。

8

現存姚瑩有關臺灣的詩作合計有五十八首<sup>9</sup>。檢視《全臺詩》，可知他是第一位為臺

---

墾，1812年乃設置噶瑪蘭廳。

<sup>4</sup> 詳見姚濬昌《姚瑩年譜》，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八三冊《中復堂選集目錄》附錄二，頁242。就姚瑩的仕宦經歷來看，他在臺灣獲得的助力，恰可與他在內地受到的壓抑形成對照，羅運治〈鴉片戰爭時姚瑩防臺措施的探討〉即指出：「（姚瑩）仕宦歷程中，能獲有最自主決策，發揮才識，凸顯其成就感者，則以臺灣道仕內為最。」（《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二十三期，1991.7，頁114）

<sup>5</sup> 依《姚瑩年譜》的記載，姚瑩罷職後的「旅寓甚乏」，多賴士民主動濟助。相對地，姚瑩罷職後居閩，仍不停遭受內地官員的打壓：「在閩日久，洞悉利弊，趙公多所咨訪，于是忌者日眾，乃力辭出省，遊福清，忌者不已。適穎齋方公調任臺灣，邀同往，遂渡海。」十月抵臺時的「士民爭以鼓吹來迎」（同上，頁243），臺灣的人情對姚瑩而言，自有一份醇厚之情。

<sup>6</sup> 兵備道始設於明代，清朝沿用之，平時興學教化、修葺城池及審理訴訟，戰時則帶兵出擊、救平亂事。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設置於1791年，前身為福建分巡臺灣兵備道，改置後將正四品道員官銜提高為正三品按察使官銜，同時將福建省監察臺灣的職務劃分與臺灣道，又稱為臺道、臺灣道、分巡臺灣道。

<sup>7</sup> 1840年7月16日，英軍犯鹿耳門外馬鬢隙；1841年7月，英軍再度向北犯；10月19日，英軍三犯雞籠；1842年3月11日，英軍四犯大安港。姚瑩〈與光律原書〉：「夷五犯臺灣不得一利，兩擊走，一潛遁，兩破其舟，擒其眾而斬之。」（收入臺灣文獻叢刊八三《中復堂選集目錄·東溟文後集》卷八，頁153）

<sup>8</sup> 大天后宮位於臺南市永福路二二七巷十八號。此聯收錄於蔡相輝《臺灣的王爺與媽祖》（臺北：臺原，1989.1），頁185。

<sup>9</sup> 《中復堂選集》輯錄《後湘》二集、續集，共有古詩十一首，律詩三十三首，絕句十四首。詳見施懿琳主編《全臺詩》（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出版，2004.2），頁68-90。

灣入獄的詩人，其〈十幸齋記〉云：

臺灣之獄，江、廣、閩、粵四省大帥為夷所懾，彈章相繼，或且為書，偏布京師，曰：不殺鎮道，無以謝夷而堅和約。然而朝野之論，殊不謂然，論救之章相繼；聖主亦念其勞，為之昭雪。其幸六也。<sup>10</sup>

「臺灣之獄」牽涉到中英關係與臺灣定位，更在朝野引發一場攻防論戰，論戰的關鍵點就在姚瑩的功／罪與生／死，而清帝更實際參與了整個事件的始末，是瞭解臺灣與內地乃至朝廷關係所不可或缺的一環，夏燮更專文撰述《臺灣之獄》辨明始末<sup>11</sup>。姚瑩除了留下許多與「臺灣之獄」有關的公、私文書外，現存詩中涉及入獄情事者有六首，其中之一為七律連章詩八首，合計有詩十餘首。且六首中的四首或有詩序，或詩題長如序，詩題、詩序與詩的互文關係，尤可見其心事，值得深入探究<sup>12</sup>。

## 二、姚瑩重繪世界地圖所標示的臺灣島位置

臺灣地處四海之外，清初尚存有是否納入中國版圖的猶豫，《清史稿》〈地理志·臺灣〉序言即指出：「臺灣：古荒服之地，不通中國，名曰東番。」<sup>13</sup>因此，當施琅領軍攻入臺灣，鄭克塽投降，對於孤懸海外的臺灣，朝廷上曾引發如何發善後的爭議，甚至有主張遷人棄地者：

臺灣初定，提督施琅請設官鎮守，廷議未決。有謂宜遷其人、棄其地者，上

<sup>10</sup> 見《東溟文後集》卷九，頁157。收入臺灣文獻叢刊八三《中復堂選集》。

<sup>11</sup> 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三〇九冊《臺灣關係文獻集零》之十一，頁83-88。

<sup>12</sup> 關注到姚瑩為臺入獄的研究並不多，廖漢臣〈鴉片戰爭與臺灣疑獄〉（《臺灣文獻》第十六卷一期，1965.3）是目前所見最早討論到冤獄的一篇，其餘數篇多為姚瑩治臺事蹟的探討。學位論文則自王春美《姚瑩的生平與思想》（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5）之後，近年始又見謝貴文《姚瑩的經世思想與在臺事功》（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此外，施立業《姚瑩年譜》（合肥：黃山書社，2004.11）對姚瑩入獄有比較詳盡的引述。在這些研究中，姚瑩詩尚未獲得重視。

<sup>13</sup> 詳見新校本《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1.1），卷七十一，頁2263。

問閣臣，霽言：「臺灣孤懸海外，屏蔽閩疆。棄其地，恐為外國所據；遷其人，慮有姦宄生事。應如琅議。」上韙之。<sup>14</sup>

在漫長的歲月裡，臺灣以化外之地而隱沒在歷史地圖之外。即使歷經荷蘭的三十八年統治，以及明鄭二十三年的政權，清初仍有「棄其地」的主張，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置臺灣府，屬福建省，才正式與中國內地建立行政關係。在歷任的官員中，姚瑩應是最能掌握臺灣特性的<sup>15</sup>，他在施政與書寫中所映現的斯土斯民，讓臺灣在一個重新繪製世界地圖的年代，獲得更多標示自己位置的機會。以下嘗試透過姚瑩與不同對象的對話，把臺灣帶入更多人的思考層面，包括身在其中的臺灣人、隔著黑水溝的上級長官，乃至遠在京城的天子，各有不同因素卻共同呈現出對臺灣的不見／忽視，姚瑩以各種策略與公／私文件誘發人們對臺灣的參與，把臺灣的人民與土地鐫刻到許多人的印象裡，交互牽引／映照出的臺灣記憶，成功地把「臺灣」推上當時的世界舞臺。

### （一）由邊鄙到堡壘 臺灣位置的浮動

由於航運的發展與商業活動的日漸頻繁，特別是外國的入侵，使得清中葉以後相關地理書籍的翻譯、撰寫與印行，成為重新建構世界觀的重要指標。姚瑩著力於搜集海外圖書，其〈復光律原書〉云：

自嘉慶年間，贈求異域之書，究其情事，近歲始得其全。<sup>16</sup>

主動尋求對域外的了解，使姚瑩所認知的世界，就不再局限於四海之內的大陸，而把視域擴大到更遼闊的世界舞臺，因而覺知到英國為「近世所傳極富之國」，以及不同於中國長期封建專制的新制度：

<sup>14</sup> 同上，卷二百五十〈李霽列傳〉，頁 9686。

<sup>15</sup> 對清代宦臺官員的研究，施懿琳《清代臺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1990）有比較全面的掌握，可參閱。羅運治〈鴉片戰爭時姚瑩防臺措施的探討〉也指出：「綜觀姚瑩一生，其最精華、盛壯的二十四年歲月，幾乎都投注於臺灣，尤以最後五年臺灣道任內，適逢鴉片戰爭前後最為艱苦，亦最具成就。」（同註 4，頁 94）個人的關懷面加上時局的變化，都促使姚瑩更能夠深入去了解臺灣的特性。

<sup>16</sup> 見《中復堂全集·東溟文後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卷八，頁 771。

革世襲之職，皆憑考取錄用。開港通市，日漸富庶，遂為歐羅巴大國。

近代英國雖然保持君王世襲，在用人制度上則已以考試錄用取代了世襲，加上發展航運與商業，使土地面積不大的英國成為歐洲第一大國。姚瑩更於英軍犯臺時，要求英軍俘虜繪製西方地圖，並於訊囚時得知：

海中諸國最強大而為英咭喇所畏者，一曰咪喇口堅，華人稱為花旗，在的賒士之西。二曰佛蘭西，皆地大於英咭喇，而船炮如之，亦好貿易，與賀蘭、黃祁、大西洋，俱在廣東通市，頗恭順。<sup>17</sup>

依姚瑩的認知，英國雖強，還有足可與之抗衡的美國與法國，而世界就由這些強國所主導，更清楚體認到航運、武器與貿易是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指標。

由於視域的擴大，中國就不再是獨大的「泱泱上國」，而原本位處中國地圖邊陲的臺灣，一旦繪入世界地圖時，就浮現出「前哨」的關鍵位置，成為有意介入／經營與清朝關係者的一個據點，值得深入去瞭解，更必須用心去經營。檢視姚瑩著作時最引人注目者，乃豐富的地理論述，尤其是前言所引有關臺灣諸作；而臺灣經驗之後，姚瑩更著力於地理方面的考察與撰寫，有《卡倫形勢記》、《康輶紀行》、《前藏三十一城考》、《察木多西諸部考》、《庫倫記》、《乍丫圖說》等西部邊陲的著作；而《英吉利地圖說》、《記英俄二夷構兵》二書，更成了瞭解當時世界局勢的重要著作。

因此，在姚瑩嘗試重新描繪的世界地圖中，「臺灣經驗」顯然具有關鍵性的作用，由於身處其中、親歷其境的同甘共患，姚瑩所標示的臺灣島位置，實已進入了更為深層的人文地圖。以姚瑩為臺灣所作的種種規畫與策略而言，都能夠清楚標示出海洋空間與島嶼特性，其〈上防海急務第二議（辛丑正月）〉即指出：

伏思臺灣孤懸海外，南北二廳、四縣，綿亙一千四百餘里。雖云水陸官兵一萬四千，除澎湖一協隔海外，在臺水、陸三千，分守十七要口，實形單薄。陸路弁兵，分防一百四十二汛，僅敷彈壓。而民情浮動，奸宄時萌；近又查拏鴉片嚴謹，愚民惡習一時未能湔洗。自定海失守，洋船遠奔臺、澎，深恐

<sup>17</sup> 姚瑩〈覆訊夷供分別斬決留禁繪呈圖說奏〉收入臺灣文獻叢刊四九《東溟奏稿》卷三，頁126。

在地奸民，乘機竊發；內靖外攘，十倍內地之難。欲計安全，非徒手所能為力。再四熟商，現有急要四事，不得不仰陳於仁憲者，一曰海外經費不可不裕……二曰大餉扣抵不可過多……三曰派委大員協守澎湖……四曰新鑄大炮分給臺澎。<sup>18</sup>

臺灣孤懸海外的特殊地理位置，與長達一千四百餘里的海岸線地形，使臺灣具有重要門戶而又極難防守的戰略地位。而當時的臺灣軍力，水陸軍（含澎湖一協）約一萬四千多人，其中本島水師只有安平一協、艦艍參將約三千人，分守十七處口岸，以及陸師數千人，分守郡城內外及諸廳縣的一百四十二汛。除員額編制的不足外，需求最殷切的是經費與武器。依姚瑩於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四上〈臺灣防夷經費請作正支開銷狀〉所載：臺灣防務自道光二十年九月至十二月，十七處口岸共用防夷弁兵 3481 名，屯丁 200 名，鄉勇 2460 名，水勇 520 名，開銷紋銀二萬四千六百多兩。官方編制顯然無法滿足防衛臺灣的需求，因而民間力量就成了極重要的資源。也因此，臺灣既是外國介入／經營與清朝關係者的「前哨」，對清帝國而言，則是防衛外國勢力入侵的「堡壘」；而臺灣如何在姚瑩苦心經營與士民的通力合作下，從前哨／堡壘二元對立的宿命爭脫，首度憑藉自己的力量在歷史扉頁寫進「臺灣」兩字，是下一步要探索的議題。

## （二）「協力同心」的地方自保策略

相較於姚瑩首度出任福建平和、龍溪知縣時的以法治縣<sup>19</sup>，調任臺灣知縣與噶瑪蘭通判後，轉而以恩信撫民，多方規劃，興利除弊，不務苛細，故能官、士、民同心，有效達到「內靖外攘」的保臺任務。

### 1、對臺灣人民生活習性的分析

<sup>18</sup> 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六四種《澎湖廳志》卷十三藝文（中），頁 412-415。

<sup>19</sup> 姚濬昌《姚瑩年譜》指出：「龍溪悍風尤甚，械鬥仇殺無虛日，盜賊因之四出，官兵無如何。府君至，曰：『此亂民也，非繩以重典不可。』……更選民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壯勇者，養之擊捕盜賊。手擒巨惡數人，訊實罪狀，臚榜郭門，使萬人環觀而斃之，遠近股栗。於是，循行田野，親至各社，曉以大義，經其疆理，字其幼孤。暇則課農勸學，一時棄刃修和者七百餘社，漳人大悅。」（頁 240）



由於臺灣孤懸海外，與大陸之間的海上交通變數很多，一遇外敵入侵，即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因而與當地土民緊密結合，發展出休戚與共的患難情感，成了確保臺灣安全的不二法門。姚瑩深切了解到這一點，在〈答東信齋論臺治事書〉中即明白提出「為政在于得民，而得民者必與民同好惡。」、「官民一體」（卷 4）的主張。對於臺灣人民的生活習性，尤有深刻分析，其〈上督撫言全臺大局書（庚子四月）〉有云：

臺灣孤懸海外，南北綿互千數百里，地氣本浮，人心好動，命盜案多，甲於通省，分類械鬥，變生頃刻，布謠脅惑，謀逆造反，習以為常。治理弛張之道，與內地迥不相同。南北兩路情形，又與郡城大異。蓋郡城有鎮道府重兵鎮守，姦民尚知所畏。嘉、彰一帶，毘連內山，為匪類淵藪，隨捕隨聚，誅不勝誅。且若輩視死如歸，地方官駕馭稍失其宜，即激成大案。<sup>20</sup>

姚瑩深切瞭解到臺灣獨特的地理位置與人民習性，包括漂洋過海的冒險精神，移民社會的不安全感，天高皇帝遠的盜匪淵藪，以及為爭取生存空間所不得不採取的激烈手段，「治理弛張之道」完全不同於內地。地方官員不能體察到這一點，仍以內地思考來治臺，很容易釀成械鬥乃至謀逆造反的大案。姚瑩把臺灣的「難治」歸責於地方官員的「失宜」，因此努力說服上級長官以爭取治臺空間，如「以浮動好亂之地，當官民交困之時，為政之道，似以撫綏為先，而緝捕更不可後。」推究人民之所以會冒著生命危險渡海來臺，大都是對原有生存環境的滿意度與容忍度過低，寧願承擔高挑戰性與不確定性的風險，因而在治理上勢必要有更分明的賞罰規則，才能服人。其〈臺灣不能堅壁清野狀〉陳五難，其二至五都與人有關：

沿海之人，十九皆窮，其心叵測，綿互千數百里，人口繁眾，遷之則無地可容，無業可活，置之則引敵登岸，無所不為，其難二也；臺地惡習，最忌遷移，匪徒每欲為亂，則造言恐嚇居民遷徙，乘間為亂，其難三也；沈舟載石，固可堵塞口門，然無兵勇守之，則堵者仍可以開，塞者亦可以去，其難四也；臺人好亂，無事猶造播謠言，若撤退守口之兵，則明示以官兵懦怯，良者以

<sup>20</sup> 收入《中復堂選集·東溟文後集》卷六，頁 119。

為官棄其民，姦人益啟猖獗之志，其難五也。<sup>21</sup>

漫長的海岸線是早期人口主要聚居之地，且「十九皆窮」，謀生與轉業都不容易，本就難有作為；再加上臺灣人民最忌遷移，「造言恐赫」的謠言也就特別容易奏效，這就給了生事者很大的空間；而守口官兵本就不足，一旦事急撤退，就會被質疑懼怯而棄民遁逃，這些都造成治理上的難度。因此歷來治臺多採壓制與挑撥而形成恐怖平衡，白白耗損了許多建設的契機<sup>22</sup>。姚瑩則清楚看出臺灣人民的可畏與可敬處，其〈雞籠破獲夷舟奏〉云：

蓋臺人浮動，易為亂而亦易為義；駕馭貴合機宜，爵賞不可吝惜，得其心庶得其力。<sup>23</sup>

不同於多數大陸地區人民的保守固執<sup>24</sup>，臺灣人民的可塑性顯然要強得多，為亂為義，端看統治者的領導方式與用心程度。統治者所施予的壓力與剝削越嚴重，所激起的反彈也就越大；反之，能夠洞悉時事利病，深入體察民情，因事制宜，以爵賞代替鎮壓，建立良好的情感關係，一旦得到人民的信服，自然能夠得到很大的助力。姚瑩清楚看到臺灣人民所展現的力量，因此提出的防臺之道：

伏思用兵之道，氣不可餒，貴從容布置；言不可夸，貴切中機宜；謀不在奇，貴深明事勢；人不在眾，貴協力同心。<sup>25</sup>

如果防衛性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以人力、配備與外援都處於劣勢的臺灣島而言，事先的從容布置，與人民的誠懇溝通，對事勢的深切了解，以及官民的協力同心，都是致勝的保障。姚瑩又特別著重在「同心協力」上，在沿海各莊有團練的壯勇，小

<sup>21</sup> 詳見臺灣文獻叢刊八三《東溟文後集》卷五，頁 102-104。

<sup>22</sup> 姚瑩〈上督撫請收養游民議狀〉即指出：「竊見臺灣大患有三：一曰盜賊，二曰械鬥，三曰謀逆。三者，其事不同而為亂之人則皆無業之游民也。……賊招之則為亂民，官用之則為義勇。此皆可良、可賊，視能食者則從耳。」（臺灣文獻叢刊八三《東溟文後集》卷三，頁 39）

<sup>23</sup> 詳見《東溟奏稿》卷二，頁 37。

<sup>24</sup> 文崇一在《中國人的價值觀》一書中，由傳統與權威、重農與功名、仁義等道德三種價值取向分析中國人民習性，得出權威、保守、謙讓、謹慎、依賴、順從、忍耐、勤勞、節儉、安分等國民性格。（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10），頁 156。

<sup>25</sup> 詳見《東溟奏稿》〈遵旨籌議覆奏〉，卷三，頁 85。

漁船也都編立字號，分擔守莊、禦敵與偵查等工作<sup>26</sup>。甚至在向朝廷請撥 10 萬兩以解臺防經費之困而未果時，號召紳商捐助，由淡水貢生林占梅一次捐番銀一萬元，才緩解經費困局<sup>27</sup>。因此，他在〈與曾方伯書〉中分析保臺成功的關鍵就在「官與民一而守固」、「官與民一而有功」，並稱譽臺灣人民為「義民」<sup>28</sup>。江南道監察御史陳慶鏞於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初九日上〈海疆防堵疏〉，距離姚瑩正月二十六日被革職拏問不到半個月，即明確指出臺灣「孤懸海外，民情浮動；加以五方雜處，近來重案層見疊出」，本極難治理，又有英船不時騷擾，而卒能大獲全勝者，全在於「得人之信」，疏云：

臺灣鎮總兵達洪阿、臺灣道姚瑩平時實心愛民，其團練鄉勇固結有素，與紳耆士商俱聯為一體；故民皆信之，一時踴躍從公。其弁兵義首，輒呼立應，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三次所獲勝仗，雖由天時地利，而其實全在人和。<sup>29</sup>

當大陸沿海一再受挫於船堅炮利的英軍時，惟有孤懸海外、缺兵缺餉缺設備的臺灣島，能夠接連打敗英軍。陳慶鏞從「得人之信」的角度為姚瑩二人辯護，亦即肯定臺灣本島在官民協力同心下，共同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 2、「嚴守口岸」的保臺策略

臺灣長達一千四百餘里的海岸線，在早年海上交通不發達時，是屬於孤立而閉塞的島嶼地理特徵；及至近代西方國家全力發展航運，荷、葡及英、美、法等大國

<sup>26</sup> 姚瑩〈與王提督書〉：「以沿海各莊團練之壯勇，昨已發給告示，令沿海每保五十莊以上者，練千人或七、八百人。三十莊以上者練五百人或三百人。平時編立隊伍造具名冊，臨時聽調。半守本莊，半出禦敵。視敵人之多寡，大約非千人不足以戰。我平時不用以養其銳，臨事然後用之，則皆生力軍也。故無事則以守口為正兵，有事則出新兵以勝之。其港內小漁船，亦皆編立字號，給印旗為記，朝出暮歸，稽查奸宄。」（臺灣文獻叢刊八三《東溟文後集》卷六，頁 129-130）

<sup>27</sup> 詳見《清宣宗實錄選輯》（第 2 冊，頁 273），收入臺灣文獻叢刊一八八。

<sup>28</sup> 姚瑩〈與曾方伯書〉云：「天津、臺灣官與民一而守固；廣東官與民二，初以不振，卒之。官與民一而有功，義民固可忽乎哉。」收入《東溟文後集》卷七，頁 143。

<sup>29</sup> 疏中亦指出：「……是以敵愾同仇，不折一兵、不遺一矢，卒能收功全勝，並獲有夷人無算；上年在浙所搶兵民衣服、器械，皆在其內。凡厥士民，觀者如堵，莫不謹呼稱快。」詳見臺灣文獻叢刊第 229 種《清經世文編選錄》附錄三〈「縮經堂類稿」選文〉，頁 75。

都以船堅炮利走上世界舞臺，臺灣綿長的海岸線反而形成開放性地理特徵。這種轉變，一方面臺灣島由原本主政者眼中的化外棄地，變成野心家的必爭之地，成為近代史上紛擾最多、政權轉移最劇烈的地區；另一方面也對仕宦者形成極大的挑戰，如何克服一無屏障的綿長海岸線，在勢孤力單的情況下捍衛臺灣的安全？姚瑩歷經過多次的實地探勘後<sup>30</sup>，在〈遵旨籌議覆奏（夾片）〉中提出最適合臺灣地形的防衛策略：

臺灣各城，惟郡城臨海，最為險要。其餘廳縣，皆距海數十里，民莊皆用竹圍，足禦夷炮。獨海口沙地水鹹，不能種竹，惟令各口文武添設炮墩、土牆，相機辦理。又各口惟雞籠三面環山，險峻可守；滬尾兩山對峙，一港中通，其險次之。此外則皆一望平沙，港門皆在水中，或有暗礁沈汕猶可限阻夷舟，否則全仗人力。自當相度地勢而行，不能一律辦理。<sup>31</sup>

從郡城到廳縣到民莊，海岸地形的變化很大，開發的程度不一，植被也有所不同，必須要相度地勢來訂定不同的防守策略，不能用傳統的戰守觀念來處理。因此，姚瑩對於清廷指示「所有原設海邊大小炮位，亟須移徙內地十餘里或三、五里之扼要隘口」<sup>32</sup>的誘敵登岸戰略，明白表達反對意見，並且提出完備的「因地設施」的戰守策略，〈臺灣不能堅壁清野狀〉云：

海畔平曠，村莊散漫，處處可行，並無阨要之所……且如郡城西臨大海，城外即水，僅恃安平一鎮，橫互為衛，安平地狹，東西一里餘，南北二汕，迤邐相連，今守郡城，舍安平更無退步。城係土築，未可言堅，雖欲堅壁清野，而不可得。展轉籌思，惟有因地設施，以求萬一之濟。<sup>33</sup>

臺灣西海岸的地形並不利防守，朝廷提供的軍事設備也無法發揮保衛功能，姚瑩在

<sup>30</sup> 參見〈雞籠破獲夷舟奏〉：「再臺灣地勢綿長一千四百餘里，要口林立，臣等自上年先後親往南北大小各口履勘，築設炮墩，調兵募勇設防，復於滬尾添設石墩臺一座、雞籠炮臺改築石炮、臺左右添築石牆，併將督臣顏伯燾發運新鑄之八千觔大炮四門、六千觔大炮二門，分置安平及雞籠、滬尾三口，以期鞏固。」（《東溟奏稿》卷二，頁36）

<sup>31</sup> 詳見《東溟奏稿》卷三，頁87。

<sup>32</sup> 詳見〈臺灣不能堅壁清野狀〉，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第八三種《東溟文後集》卷五，頁101-102。

<sup>33</sup> 收錄於《東溟文後集》卷五，頁101-104。

充分了解地理形勢後，詳密規畫了海、陸併用的守戰策略：利用本土特有的大竹篾編為夾牆，中實沙土，成為為守兵的避炮防具；又挖掘長濠，埋釘桶，在港門內橫列大木數排，架設棉包、牛皮，妥善運用極少的兵器與人力。更把防衛戰線拉到港口，先在數百大木頭上釘尖銳大鐵撓鉤，中貫巨籐，阻撓來犯的敵軍杉板；支港內則釘梅花木樁，以阻其闖突；岸上砌築石填夾牆七十餘丈，內設兵勇炮位，以防敵人佔據；對於無力防守的港口，有用不堪修葺哨船並買民船鑿沈堵塞港內者，有用大木作水鹿角橫攔水中再用竹篾載石堵塞者。尤其難能可貴者，這些規畫的目的都在確保臺海安全，其〈覆鄧制府籌勘陽夷狀〉云：

逆夷船高炮大，勢難取勝於外洋，我兵攻具未齊，目下要務，自當保固藩籬，守定而後議戰。<sup>34</sup>

顯然姚瑩並不把臺灣當作戰略位置上的前哨，而以「保固藩籬」的守土護民為施政要務。類似的籌謀規畫，一再出現在姚瑩的疏書中<sup>35</sup>，如：「夷人之長，全在大船火器」、「夷炮猛烈，自當避其所長」<sup>36</sup>，因而「但嚴守口岸，不與海上爭鋒」、「將巡洋舟師概收回，嚴守口岸」，並且在〈防夷務急狀〉中為臺請命：「臺灣向無大號戰船，倘備攻擊夷船，必須添造大船二隻或四隻分給臺澎兩營使用」、「此時夷務關重，製造大號戰船，實為要著」（頁 19）。可見姚瑩除了因地制宜以補強防衛設施，更是不斷溝通以爭取支持，才能在中央漠視與列強覬覦中，連番擊毀來襲的英國大船火器，在一再受挫於列強攻擊的清廷中，引起高度震撼，使臺灣首度在中國歷史上寫下光彩奪目的一頁。

### （三）「抑民悅夷」的中央政策

當英軍一再騷擾大陸東南沿海而得逞時，臺灣以獨力連敗英軍而震撼朝廷，並

<sup>34</sup> 詳見《東溟文後集》卷四，頁 72。

<sup>35</sup> 如〈與王提督書〉、〈防夷急務第二狀〉（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八三種《東溟文後集》卷六、卷五）等。

<sup>36</sup> 參見《東溟奏稿》卷三〈遵旨籌議覆奏〉，頁 85；《東溟文後集》卷二〈夷船再犯雞籠官兵擊退奏〉，頁 41。

獲得清君連番褒揚，卻不能確保臺灣應有的合理待遇。畢竟在行政區域的劃分上，臺灣僅屬於福建省的一府；在中央的政策上，南京和議更使臺灣的軍事勝利被嚴重扭曲，使姚瑩與達洪阿由「大揚國威」而獲得「特沛殊恩，以嘉懋績」，轉變成「逮鎮、道入都」並交刑部會同軍機大臣偵訊的階下囚，除了驗證一般熟稔的天威難測的君主形象，更凸顯出中央立場與地方權益的嚴重落差。

## 1、天威的難以測量

以臺灣綿長的海岸線，本就有鞭長莫及的難守困境，而姚瑩在深得人心與因地制宜的防臺策略下，每一地區的守兵與民勇都形成綿密而又具有高度機動性的防衛網，因此臺灣才能以毫無奧援的海外孤島，屢次獨力成功擊退來襲的英船，絕對是官民同心協力的最佳典範。清君除了再三表達「覽奏欣悅，大快人心」的滿意，對達洪阿、姚瑩「以計誘令夷船擱淺，破舟斬馘，大揚國威，實屬智勇兼施，不負委任。允宜特沛殊恩，以嘉懋績。」兩位主將分別獲得加官晉級的獎勵<sup>37</sup>，對於虜獲的英人更是充滿好奇心，有上諭云：

昨據奏逆夷復犯臺港，經該總兵等生擒夷人、漢姦多名；該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該國地方周圍幾許？所屬國共有若干？其最為強大、不受該國統束者共有若干人？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無旱路可通？平素有無往來？俄羅斯是否接壤、有無貿易相通？此次遣來各偽官，是否授自國王？抑由帶兵之人派調？著達洪阿等逐層密訊，譯取明確供詞，據實具奏；毋任諱匿。

38

一連串的疑問，正好反映出清君對遠來英人的一無所悉與一籌莫展，因此也更顯得臺灣島的勝利實是意義非凡<sup>39</sup>。由於臺灣隸屬閩省，舊制雖可專摺奏事，仍需由督

<sup>37</sup> 詳見夏燮《臺灣之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三〇九《臺灣關係文獻集零》之十一，頁 83-84。

<sup>38</sup> 同上註，頁 84。

<sup>39</sup> 當時士人雖已意識到了了解西方國家的迫切性，如 1839 年底林則徐開始組織翻譯英國人慕瑞（Hugh Murray）1836 年於倫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1841 年林則徐被革職遣戍新疆伊犁，乃將《四洲志》等編譯資料交給魏源，囑其編撰成書，魏源於 1842 完成《海國圖志》，並於 1843 年出版。而這段時期也正好是姚瑩宵衣旰食奮力抗英，並藉由訊夷獲得具體資訊並繪成圖說的時候，對協助

臣轉奏，照常驛遞；爲了更快速取得訊敵的資訊，特別跳過省級而建立基層與中央直接連線的管道——由五百里馳奏，並且由清君親自裁決：「取供之後，除逆夷頭目暫行禁錮、候旨辦理外，其餘各逆夷，與上年所獲一百三十餘名，均著即行正法，以紓積憤，而快人心。」<sup>40</sup>由此建立的臺灣與中央直接對話機制，理應是上下一心，共同承擔。惟當中央派員偕同閩督在南京進行議和的過程中，爲了顧全「撫夷之局」<sup>41</sup>，臺灣又退回到邊緣的位置，原來獲得加官晉級達洪阿與姚瑩二人，由皇帝親自下令「逮鎮、道入都，交刑部會同軍機大臣訊結議擬」，最後清君更推翻前議，使達洪阿與姚瑩二人由「智勇兼施，不負委任」變成「有應得之罪」，最後落得革職的下場：

該革員等呈遞親供，朕詳加披閱，達洪阿等原奏僅據各屬文武、士民稟報，並未親自訪察，率行入奏；有應得之罪。姑念在臺有年，於該處南、北兩路匪徒疊次滋擾，均能迅速蕺事，不煩內地兵丁，尚有微勞足錄。達洪阿、姚瑩著加恩免其治罪。業已革職，應毋庸議。<sup>42</sup>

由上諭可見清君在前、後議之間的轉折，純是主政者的便宜措施，並不了解姚瑩與臺灣士民間的互信機制。而清君在「戰備／議和」上的態度猶疑，也導致朝廷大臣出現「挺姚／倒姚」兩派的傾軋<sup>43</sup>，可以看出清君態度與大臣議論之間的出入。

---

清帝瞭解西方國家，乃至與稍後出版的《海國圖志》相互對照，都應有其價值。

<sup>40</sup> 詳見〈覆訊夷供分別斬決留禁繪呈圖說奏〉，收入《東溟奏稿》卷三，頁124。夏燮《臺灣之獄》也指出：臺灣歸閩省管轄，以遠在海外，特加兵備道三品銜，得與鎮臣專摺奏事。雞籠之捷，飛章入告，陳明事關隔海，恐由督臣轉奏、稽滯軍情，未便固執；然猶照常驛遞，不敢傳遞以聞。比奉硃諭：『嗣後有攻勦夷匪摺件，由五百里奏報。如大獲勝仗，即由六百里奏報』。於是大安之捷，遵旨由五百里馳奏；而嗣此關涉夷務之奏報，驛遞入都，疾置相望。』（頁83）

<sup>41</sup> 廷寄直接指出：「倘此案稍有隱飾、不肯破除情面，以致朕賞罰不公不明，又誤撫夷之局，將來朕別經察出，試問怡良當得何罪？凜之、慎之！」見臺灣文獻叢刊一二六《清朝柔遠記選錄·道光二十三年》，頁26。

<sup>42</sup> 同註31，頁87。

<sup>43</sup>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八日諭怡良對英人採取「以安反側」的政策，云：「夷性多疑，遲則生變，務須迅速查辦，切勿耽延貽誤。」監察御史福珠隆阿即上奏指出：「拂其所願則撫局有變，遂其所欲撫局亦未必不變；拒其所請其患明而速，允其所求其患暗而大。」（《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七冊），諸多論戰分別從防英軍的「反側」、「沮天下奮效之氣」與「千秋公論」等視角發聲。施立業《姚瑩年譜》收錄許多相關的文獻資料，詳見頁275-310。

清廷「始終不欲誤撫夷之局」的政策考量，並沒有因為南京和議而緩解外強入侵的壓力，道光朝的對外關係始終擺蕩在備戰與乞和之間，除了當時積弊已深、無力對抗外國勢力的入侵，宣宗的守成有餘、圖強不足，缺乏明智的決斷力，造成決策上的反覆，在南京條約簽訂時雖承受了「一日夜未嘗暫息」的煎熬，並且在姚瑩入刑部獄後的十三天即放出，卻依然放任耆英等人的專權，苟且於眼前的平靜<sup>44</sup>。因此文宗（咸豐）即位時特別頒示謄黃，把責任推給了大臣，謂「穆彰阿傾排異己，如達洪阿、姚瑩之盡忠盡力，有礙於己，必欲陷之」<sup>45</sup>，為臺灣之獄作了徹底的翻轉，使姚瑩二人獲得平反，還給了「盡忠盡力」的公道。然而，所謂「天威」，永遠追逐著君國的最大利益，孤懸海外的臺灣，雖然曾經以獨力擊退強敵而震撼天聽，卻終究淹沒在上級長官與中央政策的擺蕩中，無法錨定自己的存在位置。

## 2、權要的伎功諉過

當清君特許臺灣與中央藉由五百里馳奏而直接對話時，閩督的狀況外處境必然是極為尷尬。除了臺灣虜獲的夷船中有騷擾閩浙的戰利品，還有為英人服務的閩粵籍奸細，何況英船在臺灣的挫敗，回過頭來從閩浙沿海獲得補償的風險，更是閩督所不樂見的。夏燮分析臺灣之獄的產生即指出：

時提臣王得祿業在澎湖病故，而怡良方授閩浙總督，廈門甫經收復，而該逆大幫近在鼓浪嶼，懼其窺臺不得逞，則仍將棄疾於廈；一聞粵東咨會之來，輒欲從權羈縻。……閩督既憾功不自己出，又以夷人性好報復，亟致書沮之；而鎮、道業已得旨訊供，澈底根辦。不數月，夷匪犯江；白門撫事之局成，而鎮、道冒功之獄起矣。（《臺灣之獄》，頁 85）

臺灣的成功對閩督並沒有加分作用，還對比出閩浙的防夷不力，甚至增加防守上的困擾。因此，閩督不但沒有對臺灣的勝利作出呼應，展開夾擊，反而與粵浙共同採取妥協的羈縻策略，使臺灣徹底陷入孤立的處境。而英人也趁機展開恫嚇的手段，一方面威脅臺灣將舉兵「劫取俘囚以逞報復」，一方面對閩督施壓，迫使閩督為「市

<sup>44</sup> 參見余新忠編著《道光事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6.9）

<sup>45</sup> 詳見夏燮《臺灣之獄》，收錄於《臺灣關係文獻集零》之十一，頁 83-88。



德於夷而紓其禍」，一再飛檄臺灣「屬將所獲之夷人、漢姦悉數解至內地」，並應允英人在福州、廈門通商。英人更得寸進尺，指稱犯臺英船都是「遭風難夷」，臺灣鎮、道「乘危徼功」，脅令江、浙、閩、粵四省大吏「各據夷人遞詞奏請欽派重臣讞其獄」，清君遂令閩浙總督怡良渡臺查辦，認定英船被獲純係「遭風擊碎」、「遭風擱沈」，以「實無兵勇接仗之事」奏聞，「袒夷抑民，因而歸其罪於官」（《臺灣之獄》，頁 85-88），全盤推翻臺灣官民的努力。夏燮最後的論斷特別提到：

臺灣之獄，外則耆相主之，內則穆相主之；怡制使之查辦此案，竟以「莫須有」三字定讞，固由伎功，亦奉政府枋臣指授也。（《臺灣之獄》，頁 88）

很顯然地，臺灣之獄的造成，是在傳統官僚系統的運作下，徹底扼殺了臺灣自主性的生存空間。有意思的是，《清史稿》評定穆相歷史定位，由「終道光朝，恩眷不衰。自嘉慶以來，典鄉試三，典會試五；凡覆試、殿試、朝考、教習庶吉士散館考差、大考翰詹，無歲不與衡文之役」的炙手可熱，到文宗特詔數其罪，即以臺灣之獄作為翻轉的關鍵：

從前夷務之興，傾排異己，深堪痛恨！如達洪阿、姚瑩之盡忠盡力，有礙於己，必欲陷之；耆英之無恥喪良，同惡相濟，盡力全之。固寵竊權，不可枚舉。<sup>46</sup>

當清廷對列強入侵毫無招架之力時，臺灣的勝利就成了維護朝廷尊嚴的惟一指標，而臺灣之獄斷送了抵禦外夷的契機，就成了文宗帝心中最大的痛。而姚瑩凝聚人心、因地制宜所建構的臺海防衛功能，也失掉了持續運轉的機制，更是姚瑩與臺灣人共同的悲痛與無奈。

### 3、地方官員的定位

長期以來的京城核心觀點，地方本就居於劣勢，更何況僻處海上的臺灣島，連是否納入中國版圖都有疑議，自然是邊陲中的化外之地。許多宦臺官員難掩淪落與懷鄉的悲歎，自是人情之常。姚瑩的仕宦生涯一開始即是東南邊陲，其中更有以幕

<sup>46</sup> 詳見新校本《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三〈穆彰阿傳〉，頁 11417。

僚身分受邀來臺的經歷，宦臺期間長達十餘年，與民間有密切的互動，其用心投入與防衛戰略，更與臺人建立生死與共的伙伴情誼。

在交通不發達的年代，「海洋」所形成的阻絕性，對地方官員是一大挑戰，姚瑩曾具體指出：「至於海洋風汛靡常，文報解犯不能與內地一律稽程。有兩船同時開駕，一船先到，一船遲至數月者。有數船同開，眾船皆到，一船漂無下落者。」（《臺灣之獄》，頁 120）每一次的航行都充滿變數，臺閩之間的航程，正常狀況下並不費太多時日，卻有可能出現漂蕩海上長達數月，或者就不知所終了。除此之外，海境並不平靜，姚瑩在〈遵旨籌議覆奏（夾片）〉即指出：

惟是海洋風汛，本已不時，又有夷船盜艘出沒，阻劫船隻，過海維艱，文報往來，益形壅滯。<sup>47</sup>

不論是天然的氣候環境，或人為的盜匪阻劫，都使臺灣與內地的連繫充滿著許多變數，因此在策略上必須降低對內地／中央的依賴性。站在地方官的立場，姚瑩所亟欲為臺灣爭取的，首先即是經費，對於中央補助款被扣表達極度不滿：「近年扣款過多，撥亦愈少。及本年只發銀六萬餘兩，而兵丁逾萬，官弁數百人，刻不容緩。」（〈上督撫言全臺大局書（庚子四月）〉，頁 122），不同於歷來以地方職貢滿足中央需求，姚瑩甚至以各廳縣應解之款劃抵，使就地支放，以解燃眉之急。其次是戍卒的嚴重不足，在全臺一萬四千名的兵員中，隔海的澎湖分去兩營，山後的噶瑪蘭有一營，山前的一廳四縣有高達一千餘里的開放性海口，守兵明顯不足，〈遵旨籌議覆奏（夾片）〉指出：

現當處處戒嚴，若遇大幫夷船，實形單薄，欲請兵內地，則本省防夷吃緊，缺額戍兵尚難補足，其不能添調可知。欲請兵外省，則客兵地利生疏，未見十分得力。且遠隔重洋，緩不濟急。（《東溟奏稿》卷三，頁 84）

姚瑩清楚意識到內地的奧援既不可能也不可靠，而「兵事頃刻變易，全在不失機宜，非成法所能盡者」，反覆思維，關鍵點仍在於如何看待「臺灣人」。乃建立以「本土」為核心的思考模式，大膽起用本地義勇：「以臺人習鬥，膽氣較優，且自衛鄉

<sup>47</sup> 收入《東溟奏稿》卷三，頁 84。

邦，其情較切。若曉以大義，優其爵賞，尙可有爲。」破除臺人「難治」的慣性思維，才能夠瞭解甚至欣賞臺人的膽氣與習武風尚，再把捍衛個人生存的努力引導向「自衛鄉邦」的鄉土情感，促使各民莊自相結聯，再結合官兵共同禦敵，自然形成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體。姚瑩〈復梅伯言書〉更明白指出：

頃覆制府書有云：以結人心、安反側為本計，籌經費、繕守備、和文武、策群力為亟圖。區區之愚，所以治臺、守臺之術，不外乎此。惜同事武人不知方略，性復矜猜不洽輿情為可慮耳。惟有委曲善全，期無債事。然亦極費經營矣。至於夷人，大局一誤再誤，人所共知。瑩則以為畏蕙者固非，而輕敵者亦未為是。忠於謀國者，總當無立功好名之心，審量事勢機宜，善權終始，豈一言所能概耶？瑩職在守土，惟知守土而已，不敢他及也。<sup>48</sup>

做為一個地方官，姚瑩「職在守土，惟知守土」，與人民站在同一陣線上，克服所有的隔閡閒隙，積極籌措經費，由海而陸設置了層層的防護工事，成功地化解了達洪阿與王得祿的紛爭<sup>49</sup>，並不藉機成就個人功名，更不想創造業績做為個人調回中央的跳板。因此才能使英船五犯臺灣而不得一利，論功行賞時更對助守民兵落實「優其爵賞」的初衷，文武守兵原報就不隱匿士民所獲，鎮、道原奏也都據稟報彙敘，全無掠美居功的情事。因而當清廷與英簽訂「南京條約」時，耆英、伊里布暨閩浙總督怡良一致指責「總兵達洪阿、姚瑩妄稱接戰俘虜，冒功捏奏，混行殺戮」<sup>50</sup>，姚瑩才能理直氣壯地為自己辯護，其〈奉逮入都上浙撫劉韻珂書〉有云：

夫冒功者，必掩人之善以為己美；未有稱舉眾善，而以為冒功者也。雞籠之地，距郡程十日；大安稍近，程亦五日；皆在臺之北境。兩次擒夷，均非鎮、道身在行間，惟據文武、士民稟報之詞耳。自古軍中驗功，皆馮俘馘、旂幟、鎧仗，有則行賞，故人人用命；非如獄吏以摘姦發伏為能。……臺中環甲之士不懈於登陴，好義之民咸奮於殺敵，乘危取亂，未失機宜。夷舟前後五犯

<sup>48</sup> 收入臺灣文獻叢刊八三《東溟文後集》卷七，頁 131-132。

<sup>49</sup> 《夷氛聞記》（收入歷代史料筆記叢刊《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卷三對此有詳細記載。在化解紛爭之後，對抗英船的襲擊上，王得祿自募精兵三百出駐澎湖，達洪阿出郡城南路，姚瑩親赴北路至雞籠兩路口岸，三方相互呼應，是成功保臺的關鍵。

<sup>50</sup> 詳見《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六五，頁 2485。

臺洋……卒得保守巖疆、危而獲安，未煩內地一兵一矢者，皆賴文武士民之力也。第無以鼓舞而驅策之，焉能致此哉！……在事文武，方賞勞之不暇，豈為鎮、道不在行間、功不出己，遂貶損其詞哉！<sup>51</sup>

把英船五犯而不得一利的功勞，始終歸給在第一線用命的文武士民，強調不能因為貶損鎮、道而抹殺了基層的功勞。故而怡良渡臺逮問鎮、道時，不但郡兵不服，人持一炷香赴欽使行營泣懇；即使未邀夷案議敘的士民，也都遠近奔赴，具呈為鎮、道申理。就一個地方官而言，姚瑩可謂真正融入當地，永遠站在文武士民的立場著想，才能深得民心，坦然渡過一場政治性的牢獄之災。

### 三、保臺抗英而遭讒入獄的詩人書寫

姚瑩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以「冒功」罪，正月二十六日制軍至臺傳旨革職拏問，三月渡海，五月自福州北上，輜車三千里，於八月十三日入刑部獄，二十五日赦出。總計事發至結束擾攘達七個月，實際在獄時間則僅十三天。時姚瑩五十九歲，往來公文書據事論理，深切著明，進退坦然，辯才無礙，誠可見桐城派經世文章之所以傳世。姚瑩論詩，歸於《風》、《騷》傳統所體現的「興觀旨」<sup>52</sup>，強調詩歌必須要有真情實感，其〈孔衢浦詩序〉云：

詩為六藝之一，動乎性情，發乎聲音，暢乎言辭，中乎節奏。其始也必有所感，感於情者深厚，然後托於辭者婉摯，使人讀之，不覺其何以油然興觀群怨，此古詩之所以可貴也。<sup>53</sup>

有感而發且蓄積深厚的作品，才能引發讀者興、觀、群、怨的感應，使作者、作品與讀者連結成一氣，成為激勵人心的重要媒介。其《康輜紀行》云：

<sup>51</sup> 見《臺灣之獄》附錄，頁 90-91。

<sup>52</sup> 姚瑩有《論詩絕句六十首》，其二云：「辛苦十年摹漢魏，不知何故遠風騷。而今悟得興觀旨，枉向凡禽乞鳳毛。」

<sup>53</sup> 詳見《東溟文集》（文海本）卷二，頁 97。

或謂余一腔熱血何必掬以示人？余謂君血自未真熱耳。所謂熱血者，視天下國家之事，皆如己事；視人之休戚痛癢，如己之休戚痛癢。輾轉於懷，不能自己，夫是之謂熱血。<sup>54</sup>

情感蓄積到一定的能量，才能夠超越個人的身家名利，深切體會到他人的是非得失，關心天下國家大事，感激忠義，苦口婆心，以至於強聒不休。姚瑩認為這正是三教聖賢著書垂訓的苦心。因此，他提出詩不可苟作的主張：

古人詩不苟作，故妙。今人詩文不及古人，病正在一苟字。無情而作，無才而作，無為而作，皆苟也。（同上）

作詩要有情、有才、有為，才能發揮興觀群怨的詩用。以此來看姚瑩有關臺灣之獄的詩作，從獄中書寫，到出獄數載後的記憶，特別是詩題的詳盡有如詩序，詩中所加上的自註，與詩所產生的互文關係，都是閱讀時不可忽略的視角。

### （一）主政者在舉才與斷獄上的明辨能力

姚瑩在道光十八年調任臺灣兵備道，到二十三年被革職拏問，總計這一次在臺的時間有五年。被逮的日期是一月二十六日，於三月渡海抵達福建惠安，有詩〈奉逮內渡抵惠安縣〉抒寫心情，云：

五年蛟窟橫戈厭，十日鯨波挂席平。忽見風吹青麥隴，始知海內又清明。  
九重宵旰未言勞，幾省軍儲尚驛騷。嚴譴猶承主恩澤，馬聲人鬢兩蕭蕭。<sup>55</sup>

面對攸關名節生死的大獄，姚瑩並沒有表現出驚懼、爭辯、焦慮、怨懟乃至忿恨的不平之鳴<sup>56</sup>，反而對睽違五年的「風吹青麥隴」的內地景觀有著興味盎然的關注。因此第一首就由在臺的五年歲月談起，孤立在大海中的臺灣島，本就有「民情浮動，

<sup>54</sup> 詳見姚瑩《康輜紀行》（臺北：廣文書局，1969.7），卷15，頁8。

<sup>55</sup> 見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四冊（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出版，2004.2），頁80。為避繁瑣，以下僅於引詩後註明頁碼。

<sup>56</sup> 姚瑩入獄究竟有無怨懟不平，在詩、文中有不同映現。以奏議、書信的表白而言，如〈與光律原書〉所指出的「獨念以天朝全盛之力，絀於數萬里外之醜夷，失人心、傷國體，竟至不可收拾，是不能無恨耳！」（收入臺灣文獻叢刊八三《中復堂選集目錄·東溟文後集》卷八，頁153）可見姚瑩的憾恨在於國事的不可為；就詩的抒發個人情性而言，則是無愧無懼亦無悔。

外阻大海，內逼悍番，游民錯處，姦宄時作」<sup>57</sup>的問題，又面臨外敵一再騷擾沿海的威脅，使得姚瑩隨時處在備戰的狀況。前引〈與梅伯言書〉提出的守土方略，即坦言除了治臺、守臺的諸多繁重工作外，加上同事武人的生性矜猜、不洽輿情，可說是「極費經營」<sup>58</sup>。因此，首句的「橫戈厭」三字，可以想見姚瑩在臺五年，始終處在緊繃的情緒中，不敢稍有鬆懈。而這一次的渡海又是出奇的風平浪靜，十日就已抵達陸地。兩相對照，奉逮渡海的航程竟成了難得的輕鬆。而一上岸放眼所見，盡是青青麥隴，在和風吹拂中盡情舒展，恍然覺知到春臨大地的欣欣生意。相形之下，五年的橫戈歲月，過著應是沒日沒夜、枕戈待旦的日子，以致於幾乎忘了春天的存在。大獄當前，短暫沈迷在清明春景的姚瑩，若非襟懷坦蕩，孰能如此。

第二首回到题目的「奉逮」，對於這次事件的最後裁決者——位居九重之上的君王，在多次的公文書往來中，姚瑩願意相信他是一位宵衣旰食、勤民聽政的認真君王，只是在沿海各省的軍事布局與防守措施上，步調並不一致，所傳遞給中央的訊息自然因紛雜而引起恐慌。這一次由褒獎戰功到傳旨革職拏問的「嚴譴」，明顯是由於省屬大吏的刻意打壓而影響到上位者的判斷，也因為如此，姚瑩依然把事件的發展寄望在君王的善意上：相信至高無上的君王，能夠在紛雜的訊息中作出明智的判斷。事實上，在封建的年代，姚瑩似乎也只能作這樣的期待，因此結尾的「馬聲人鬢兩蕭蕭」，在一片青青麥隴中，映襯出蕭蕭兩鬢的霜白；而逢此清明時節，還來不及體會家鄉的滋味，就在蕭蕭馬鳴聲中邁向天威難測的京城。即便如此，姚瑩詩中所透顯的，仍是心存忠義，在深厚婉摯中自有一股坦然之氣。

在封建時代，士人的實踐理想，是建立在預設一個聖明君主的存在上。儒家強調人人可以為堯舜以鼓舞世人，杜甫以「致君堯舜上」做為終身職志，即使是送一位落第者還鄉，王維仍然以「聖代無隱者」來描述朝廷<sup>59</sup>。姚瑩有關臺灣之獄的書

<sup>57</sup> 詳見《姚瑩年譜》，頁 249。

<sup>58</sup> 收入臺灣文獻叢刊八三《東溟文後集》卷七，頁 131-132。新校本《清史稿》卷三百八十四〈姚瑩傳〉也記載：「道光十年，特擢臺灣道。及海疆戒嚴，瑩與總兵達洪阿預為戰守計，達洪阿性剛，與同官鮮合，瑩推誠相接，一日謁謝曰：『武人不學，為子所容久矣，自今聽子而行。』」（頁 11670）可見姚瑩在處理臺灣事的委曲與用心。

<sup>59</sup> 《孟子·滕文公上》引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十三經注疏本，頁 15）；

寫，入獄前採用古文體，據事論理，慷慨深切，是可傳世的應用文書；入獄及出獄後則選擇以詩體寫作，情真辭婉，讀之可得興觀之旨。其中對君臣之際的護持，尤見苦心，〈獄中夜坐〉一詩即把入獄與赴考做了巧妙的連結：

棘垣重柝中秋夜，恍惚三場射策時。坐對一窗好明月，不知身在白雲司。（頁 82）

姚瑩入獄的第三天適逢中秋節，獨自面對不可知的命運，與世隔絕的孑然，忍不住想起當年的「秋闈」，懷抱著滿腔的熱血，期待著為世所用，一肩挑起天下國家之事，全力分擔人民的休戚痛癢。如今彷彿再經歷一次的科考般，檢驗著主考官的識人能力，能否在各逞機鋒的語文論述中，為國家拔擢真正的人才？當年的三場射策，使自己有機會實踐經世濟民的理想；而今的刑部獄，是否也能如當年的闈場，給自己一個完成理想的機會？主考官與斷獄者掌握了才志之士的機會，更關係到政治良窳與國家興衰，這是才志之士所無能為力的。因此，姚瑩讓自己卸下憂國憂民的重擔，「坐對一窗好明月」，一樣如蘇東坡出獄南遷所寫下的「孤月此心明」（〈次韻江晦叔〉），不論獄中獄外，自己的心志依然昭著。即使經歷天威難測、長官不愛、奸人誣陷，深陷攸關名譽與生死的牢獄中，姚瑩依然坦坦蕩蕩，透過一方小窗，映現出如秋月般既孤且明的心志。

出獄之後，姚瑩對於自己入獄所引起的回響，寫下〈出獄後，聞今年正月臺諫諸公先後上言爭臺灣事，一時中外作詩著論者甚眾，閨閣中亦多感詠。近傳臺人復有輿論之刻，自非盛朝寬大，何能有此，感成一律〉：

聖主如天宥直臣，四方幽隱各紛陳。微名詎遂傾中外，國是從來有屈伸。永夜憂當紓魯女（作者註：「女史沈湘佩有讀史詩。」）故人書尚問吳莼。朝來紫禁綸言下，道路傳呼頌至仁。（頁 84）

姚瑩從擊退來襲英船的功臣，由於南京議和而變成冒功倖進的罪人，這種因政策考量而翻轉是非功過的巨變，對盡忠職守、殫精竭慮以報效國家的臣子而言，本就情何以堪。再加上一些有利害衝突的同僚，為了個人利益而不顧大局，《清史稿》即

---

杜甫詩句出自〈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王維詩句出自〈送綦毋潛落第還鄉〉。

記載臺灣大捷時特許越級專章奏事，使「總督怡良心不平」，更在處理戰俘上惹得「怡良愈怒，諸帥並忌之」<sup>60</sup>；而臺灣以海外孤危之島，內有不靖之亂民，外有憑陵之夷寇，卒能眾志成城，五破船堅炮利的夷艦，對照東南沿海四省的慘敗，自然會使四省大帥有「不殺臺灣鎮道，我輩無立足之地」<sup>61</sup>的疑懼，以致於正月二十六日被革職逮問後，引起了兩股力量的拉扯，為公為私，判然分明。早在入獄之前，姚瑩就有為國為民承擔責任的決心<sup>62</sup>，又深知直屬長官及利害攸關的江、浙、閩、粵四省首長都帶有敵意，其〈與光律原書〉云：

夷五犯臺灣，不得一利，兩擊走，一潛遁，兩破其舟，擒其眾而斬之。冀以上振國威，下雪眾恥，庶幾不負所志。而江、浙、閩、粵四省，事勢已壞，夷不得志於臺灣，乃詭辭膚愬，恫喝四省大帥，脅令上聞，抵鎮道罪，復有甘心為夷作證者。閩帥以臺灣功不已出，久有嗾言。又恨前索夷囚不予。及奉查辦之命，遂迫脅無知，取具結狀，以實夷言，弟與鎮軍，惟有引咎而已。

63

在這種情況下，是非功過能否獲得公斷，關鍵就在君王的裁決，因此，詩中把冤獄得以昭雪歸功於君王。姚瑩既有入獄的打算，本已不計個人的榮辱毀譽，依詩題，出獄後才得知一個官員／詩人的入獄，所激起的回響是不分朝野、不分性別的，有臺諫上言爭辯，也有中外作詩著論，喚起了群眾對時事的關心，聚成一股龐大的輿論壓力，這在封建時代是干犯大忌而會招致強力鎮壓的。故詩的首句即以「聖主如天宥直臣」來涵納「四方幽隱」的各種言論，可以想見當時的言論必然觸及到若干平常屬於禁忌的議題。這樣的發展，是以「一個官員／詩人姚瑩入獄」而發生，卻

<sup>60</sup> 語見新校本《清史稿》卷三百八十四〈姚瑩傳〉：「時臺諫交章論救，而粵督耆英致書京師要人，謂不殺臺灣鎮道，我輩無立足之地。」（頁 11670）

<sup>61</sup> 詳見《姚瑩年譜》，頁 231-262。

<sup>62</sup> 《姚瑩年譜》記載姚瑩與達洪阿分析：「夷人強梁反覆，今一切乞權宜區處，膚受之辭，非口舌所能折辯。鎮道不去，夷或別有要求，又煩聖慮，大局不可不顧也。且訴出夷人，若以為誣，夷必不服。鎮道，天朝大臣，不能與夷對質辱國。諸文武即不以為功，豈可更使獲咎，失忠義心；惟有鎮道引咎而已。遂具辭請罪。」（頁 253）

<sup>63</sup> 收入《東溟文後集》卷八，頁 152-153。



不再囿限於姚瑩個人，而關涉到國是的屈伸。第三聯以女史沈湘佩的不眠夜吟<sup>64</sup>，與鄉里故人的貼心問候與召喚，傳達出詩人姚瑩的感動：非其罪而入獄，不見容於政治場域，來自知音的支持與故鄉的擁抱，使詩人深切感受到「德不孤」的溫暖情意。結聯以自己能在刑部獄十三天即獲得釋放，關鍵點仍在於君王體會到群眾的心聲，這對國是的發展絕對是正面的，群眾也以「道路傳呼」來呼應君王的仁慈聖明。在獄時的心月孤明，出獄後的善體君心，都讓姚瑩歷經訟獄而能心志坦然，繼續在危亂的年代以滿腔熱血盡其忠義。

## （二）臺灣之獄所關涉的公／私領域

患難中的友情，是支撐姚瑩走過牢獄之災的另一股力量。其〈梅伯言、馬湘帆、湯海秋、王少鶴四農部，何子貞編修，陳頌南、蘇賡堂、朱伯韓三侍御，疊次召余同亨甫爲觴讌之樂，九月二十六日復集蒹葭閣，蓋丙申年（1836）入都，伯言、湘帆置酒處也。諸君各以詩文見贈，余行有日，輒成七律數章酬別〉八首詩，以連章詩的方式，寫下患難真情、個人榮辱與國家安危三者之間的交攝叢結。此次宴聚的東道主是湯海秋<sup>65</sup>，張亨甫是從吳一路護送到京並亟力爲姚瑩爭取奧援者，而陳頌南、蘇賡堂、朱伯韓與王少鶴四人都曾上書營救。詩題說明這次的宴聚是九位知交

<sup>64</sup> 沈湘佩，即沈善寶（1808-1862），浙江錢塘人，父親於州判任上受同官所譖而自殺身亡，母吳浣素能爲詩詞筆扎。湘佩從母學詩文，並以「潤筆所入，奉母課弟，且葬本支三世及族屬數椁。」（見施淑儀《清代閩閩詩人徵略》，台北：鼎文書局，1971，頁456），爲生活奔波，有詩題爲〈舟中書畫，刻無暇晷，宵又耽吟，深以自嘲〉，其〈澹齋軒初稿序〉自述：「善寶抱書痴於陋室，負詩癖於寒窗。午夜搜吟，未甘畫虎；庚晨涉獵，辛苦雕蟲。」可謂獨鍾於詩、夜吟不輟者。沈母有〈寄長女善寶壽光〉詩云：「爾負奇男志，吾將孝子看。」今存《鴻雪樓詩選初集》、《鴻雪樓詞》，編有《名媛詩話》。由於現存詩集止於道光十五年（1835），則姚瑩自註所稱「沈湘佩有讀史詩」者，今已不傳，惟據佟景文所作書序，稱譽沈詩「弔古詠物、遣興感懷之作，揆度事理，言中有物，一空前人窠臼，尤徵卓識」，不凡見識，應有與姚瑩相契處。以上資料參見《名媛詩話》（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張宏生〈才名焦慮與性別意識——從沈善寶看明清女詩人的文學活動〉（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10，頁823-845）

<sup>65</sup> 朱伯韓有詩〈癸卯九月朔日集萬柳堂宴姚石甫，丈席間話臺灣事慨然有作。在坐者爲陳頌南、蘇賡堂兩侍御，梅伯言、馬湘帆、王少鶴三農部，何子貞編修，主人海秋夫子暨予凡九人〉，開端即云：「癸卯月在酉，姚侯自獄出。天斷信明聖，忠憤得少泄。湯子亟置酒時主人乃湯海秋先生，簪紱翠賢傑。」可見姚瑩八月二十六日一出獄，眾人就亟力邀約，並於九月朔日由湯海秋設宴置酒。

爲了姚瑩出獄特別舉辦的<sup>66</sup>，地點之所以選在萬柳堂的蒹葭閣，是由於道光十四年有詔中外大臣明保人才，姚瑩雖獲推薦，卻遲至十六年（1836）秋天才獲得引見，梅伯言、馬湘帆就在此地爲入京的姚瑩設宴款待。也因爲這次的引見，次年九月即奉上諭：

臺灣爲海外要區，非熟習情形、才守兼優之員，不足以資表率。因思淮南監掣同知姚瑩，前經陶澍等保舉，朕於召見時，察其才具明白諳練，曾任臺灣縣知縣、噶瑪蘭通判，於該處情形較爲熟習，所有福建臺灣道員缺，即著以姚瑩升署，仍俟期滿再請實授，並著照例賞加按察使銜。<sup>67</sup>

此次的召見，由於姚瑩的「才守兼優」、「明白諳練」，是確定由姚瑩出任臺灣道的關鍵，而守臺護臺的成功經驗，更開啓了姚瑩與君王直接對話的空間，最後卻又演變成「臺灣之獄」的發生，對姚瑩而言，自然有許多感懷，其一云：

城南朝雨艸霏霏，高閣增寒眺夕暉。勝地祇堪埋馬骨，輕塵何必浣人衣。青山紅樹詩情壯，白髮黃華酒力微。壁上鮑吳題句在，疏槐慘澹亂鴉啼。（頁82）

在深秋的季節，姚瑩才剛經歷過一場冤獄，忍不住對燕昭王招賢的五百金買馬骨故事深致感慨<sup>68</sup>，而朝雨、輕塵等詞彙翻用王維〈渭城曲〉的語境，衣無輕塵自然不勞雨浥。姚瑩巧妙地結合二個看似不相關的典故，映現出個人獨特的襟懷：既然「視國家之事皆如己事」，則即使馬骨深埋無人買，也不會選擇「西出陽關」，更何況

<sup>66</sup> 九位知交中，梅曾亮字伯言，乾隆五十一年至咸豐六年（1786-1856），亦爲姚鼐門人；馬沅字湘帆，？-道光三十年（？-1850），湯鵬字海秋，嘉慶六年至道光二十四年（1801-1844），王拯字定甫，一字少鶴，嘉慶二〇年至光緒二年（1815-1876），何紹基字子貞，嘉慶四年至同治十二年（1799-1873），陳慶鏞字頌南，乾隆六〇年至咸豐八年（1795-1858），蘇廷魁字賡堂，嘉慶五年至光緒四年（1800-1878），朱琦字伯韓，嘉慶八年至咸豐十一年（1803-1861），張際亮字亨甫，嘉慶四年至道光二十三年（1799-1843）。

<sup>67</sup> 引自《姚瑩年譜》，頁248。

<sup>68</sup> 《新序》記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好馬矣。於是不能得者，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千金市馬骨成爲招賢納士的典故。

還有一群相知相惜的朋友，使姚瑩歷經險艱而依然能夠堅持理想。頸聯倒裝，以下句承上，即令個人有始終如一的報國熱血，志士暮年的生理現象仍是不可避免，因而上句先以詩人身分開出壯闊的詩情；而青山、紅樹、白髮、黃華的豐富色彩與盎然秋意，姚瑩的詩人身分明顯地凌駕在官員身分之上，是姚瑩能夠在政治場域的挫敗中，依然具有清風明月般襟懷的重要因素。結聯的鮑吳題壁，在秋意肅殺中益發顯得知己的可貴。其二全就知交情誼發揮<sup>69</sup>，因與臺灣之獄無直接關係，姑置不談。其三特別就陳頌南、蘇賡堂、朱伯韓與王少鶴四人的營救致意：

江東儔侶半凋蕭，日下耆賢久寂寥。何意海禽方鍛羽，又逢秋鶚盡摩霄。壯懷力振迴天地，抗論神飛見賈鼯。聖主已聞容直諫，封章頻數莫辭勞自註：  
「頌南、賡堂、伯韓皆直言見納，少鶴亦著讜論。（頁 83）」

姚瑩自比「海禽」，有張九齡〈感遇〉之「孤鴻海上來」一詩的深意，即使遠在海外孤島，也難逃弋者的傷害<sup>70</sup>，也有謝朓〈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詩中「常恐鷹隼集，時菊委嚴霜」的危懼，卻沒有張詩「今我遊冥冥」與謝詩「寥廓已高翔」的尋求解脫。頸聯益見奮起，乃由於四友的力挺，紛紛抗顏直諫，交章論救，他們的忠言讜論發揮了扭轉局勢的作用，對忠而被謗、身陷險境的姚瑩更是莫大的激勵。其中朱伯韓有〈癸卯九月朔日集萬柳堂宴姚石甫，丈席間話臺灣事慨然有作。在坐者為陳頌南、蘇賡堂兩侍御，梅伯言、馬湘帆、王少鶴三農部，何子貞編修，主人海秋夫子暨予凡九人〉五言長古，詩中對宴席間談論到的臺灣之役有精彩的描寫：

酒半競問公，守臺何施設。夷舟作何狀？攻戰復何術？公笑謂眾賓，茲役那忍說。獨有巡臺時，一事差快絕。夷船大創去，四戰皆告捷。虜首翻獻誠，

<sup>69</sup> 詩云：「餘霞閣上曾同醉，龍爪槐前再舉杯。此日登臨欣健在，半生懷抱為君開。衰葭莽蒼天無際，往跡銷沈恨不回。明到江南如寄問，浮山嵐翠撲人來。」

<sup>70</sup> 張九齡〈感遇〉詩如下：「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矯矯珍木顛，得無金丸懼？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謝朓詩如下：「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鵝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道，江漢恨無梁。常恐鷹隼集，時菊委嚴霜。寄言罽羅者，寥廓已高翔。」

通事來請謁。聲言警天威，願一仰麾鉞。公獨往撫之，單舸覘窟穴。杪秋蜃氣肅，海面如鏡澈。清風送歌嘯，杉板坐長筏。番童搖雙槳，容色白勝雪。約略十數輩，斂手掬起訖：使君請出看，我舟殊詭譎。蛟龍製大纛，五色下雌蜺。青紅搖海市，幻出金銀闕。鷓首盡東向，鼉鼓有行列。六爆轟雷車，怒潮中吼裂。公問此何為，番目語訖訖。謂此小夷禮，微誠幸得達。國主千萬壽，或有大慶悅。每船張百旗，金碧爛磨戛。下此禮稍殺，幢幡未可捋。君侯威德盛，義當備儀節。行行已逼近，歡聲沸蛟窟。登船皆聳觀，兩邊列刀□。鬼奴以次上，免冠掠毛髮。鋪床紫氍毹，貼錦紅鞞鞞。咬□羅珍異，華筵促密室。龍鮓味肥美，亦有鷓與鰈。老將頭虎毛，巨口恣啖噉。一酋捧楨盤，乾腊秘以醑。云是本國味，鸞刀親屢切。酒酣縱鞠□，銅鞮助嗚咽。落日送歸帆，笳鼓轉蕭瑟。海若格誠信，柔遠奠溟渤。豈獨憚國威，道力何勇決。在昔郭汾陽，免胄示回紇。古今事則殊，忠義乃一轍。

這一段跨國跨語言的描述，由中原士大夫的好奇發問，映現出中原對臺灣與夷船是同等陌生。而姚瑩在宴聚中有意略去臺灣在人力物力均嚴重短缺的情況下，想要防守英人船堅炮利的艱辛，選擇陳述勝利後的多邊接觸，有番童、白夷、鬼奴，而英船的百旗飄揚、裝備整飭，更以禮炮六響迎接姚瑩，船上設備的豪華，飲食的精良<sup>71</sup>，對比出姚瑩所用以防衛臺灣安全的簡陋工事，更顯得敵我雙方的勢力懸殊，臺海戰事的勝利也就愈發難能可貴。朱詩緊接著寫姚瑩被逮入獄的情勢翻轉：

去冬公被逮，朝議紛鼎沸。袖中萬言書，誓欲奮喉舌。既思天聽卑，公論不久屈。果然脫羅網，覆盆照湮鬱。陳湯冤不訟，周勃口終訥。將才出老儒，吾輩見管葛。異時任鈞軸，醜虜豈足滅。惜哉罹讒構，恐遂老耕堡。

對於姚瑩在忠義事績的高峰遭逢冤獄，雖因朝議與知己的交相營救而得以平反，卻不免使姚瑩對臺灣的苦心經營宣告中斷，甚至可能因此挫折而結束報國志業，以耕垡渡其餘生。這樣的發展，不但張亨甫一說起來就「痛至骨」，作者的「一腔積熱

<sup>71</sup> 這一段描寫的是道光二十二年和議之局既成，有英船在滬尾港遭風，經地方官救獲二十五人解郡，英官要求領回，並邀請姚瑩登舟。眾人擔心姚瑩因斬英囚事遭到報復，姚瑩認為「如此，愈不可不許之，以定人心也。且自古馭夷，不外恩、威、信。臺灣兩次擒斬夷囚，已足示威；生釋夷俘，已足示恩；今若不許所請，彼將謂我懼怯，且不足以示信也。」因而只帶少數人員即登上英船，使英人大為嘆服，受到鳴禮炮等禮遇。詳見《姚瑩年譜》頁 252。

血」，在宴罷返回居所的夜裡，「展卷誦公詩，歎息復屢輟。夜深不能臥，肝膽蟠峯碑。」在姚瑩遭遇與詩歌的激盪下，連夜以「直筆」寫下可供吏筆採用的詩作。故林昌彝《射鷹樓詩話》即指出：

逆夷不靖以來，竄入五海口，遂窺臺灣。適桐城姚石甫觀察瑩兵備臺灣，獲夷舟一隻及夷鬼二百餘人，置之法，天下大快之。及和議既成，夷人詭稱久服威德，請公一會於夷舟中。觀察無懼色，慨然單舸往，語氣雄直，責以大義，夷人辭屈，乃暢飲歸。余友臨桂朱伯韓侍御〈九月朔日集萬柳堂宴姚石甫丈〉云云。按此詩與〈感事〉及〈王剛節公家傳書後〉諸篇，如長江大河，魚龍百變，足以雄視古今。少陵〈北征〉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而外，少與比肩。其規矩法度，雖以杜家長鑣不能攻其一字也。<sup>72</sup>

朱詩所記臺海戰事，是史書所不記載，正可補臺灣古典詩中有關臺英之戰的書寫，可與杜甫敘事長篇相比觀。其四專就一路相從的張亨甫著墨，詩云：

接跡紛紛閩粵才，張郎巨筆獨天開。豪情半向江山盡，病骨猶含今古哀。不信斯人尚淪棄，終應聖世起蒿萊。輜車伴我三千里，出獄臨歧首重回。（頁83）

不同於前詩寫在朝為官的四友，這一首對於巨筆豪情而落拓不偶的張亨甫，從入獄到出獄的深情相隨<sup>73</sup>，姚瑩有著更多的珍惜與感激。其五由張亨甫帶出東道主湯海秋，都是屬於詩劍雙修的豪傑之士：「劍氣盤迴霜在匣，冰懷朗照月當樓」，以明月冰心的超然胸懷，做仗義行俠的入世志業。結尾記憶起兩人曾有過聞雞起舞的歲月，而今湯海秋過的是修道的生活，因此頸聯以「但須於越尋吳恥，不用新亭泣楚囚」相勉勵：面對國家困境，應該效法越王君臣復國雪恥的積極作為，而非新亭與楚囚的束手無策。對照湯海秋〈姚石甫兄入都敘舊言懷四首〉，第一首感慨久別之

<sup>72</sup> 詳見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道光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2），頁9853。

<sup>73</sup> 《清稗類鈔選錄》之「張亨甫急姚石甫難」一則，記張亨甫從姚瑩至京師，「時臺諫憤石甫之被禍，交章論救。山陽魯通甫一同又作臺灣道姚瑩功罪狀代鳴不平。及抵都，一時名公卿爭枉車騎出迓，至長新店者凡三十餘人，曾文正其一也。而石甫終入刑部獄。」（臺灣文獻叢刊二一四，頁59）郭朝瀛《十朝詩乘》記此事云：「當石甫坐事逮問，張亨甫於淮上待之，從至京師，迄昭雪出獄乃別去。」（見《清詩紀事·道光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2，頁9444）

餘，雖有「醉醒順所適，是非澹在空」的超曠語，仍受姚詩感召而寫下：「白璧豈爲拙，青蠅豈爲工。進修遭怠忌，斂退成盲聾。拳拳君子志，與我爲雲龍。氣類自古然，誰謂途將窮。」展現窮途奮起、爲雲爲龍的壯志。以下三首乃能在危疑的生存處境中不斷浮現「天高鳴鳳凰，塗長騁驥駮」、「亮茲朝天佩，大展蟠雲躡。上以葆中和，下以洗醜毒」、「動隨夔龍後，靜與周孔期」，期待有所作爲，最後更是慷慨陳辭：

願爲雙騏驎，與子同躑躅。渴飲瑤池波，飢食玉山草。擔持千鈞任，蹴蹋萬里道。守己豈所耽，濟世苦不早。日長飲醇酒，心遠倚蒼昊。蹭蹬吾無能，網繆子爲好。努力圖麒麟，吹陽潤枯槁。<sup>74</sup>

湯海秋の修道之路明顯地向姚瑩の濟世志業靠攏，即使已是時不我與，仍然冀望透過姚瑩の成就，讓自己在與有榮焉中再度喚醒當年的豪情壯志。其六特爲因入獄而結識の何子貞而發，詩末自註：「子貞初不相識，見訪於獄中。」詩中稱許何子貞兼有「清言易理」與「俊逸詩辭」兩種特質，好學深思，仰慕的是平叔、信陽之流の古代名賢，對當代士子並不輕易論交。最令姚瑩感動の是，素昧平生の何子貞，竟然毫不避諱地親自到獄中探問，「艱難獄底驚相問，忼慷樽前意不忘」，兩人對於理想壯志未能完成卻也不肯放棄の堅持<sup>75</sup>，有著深刻の契合。姚瑩認定這樣の朋友，「白頭千里獨堪商」，不管時空の距離有多大，是可以一輩子交心の朋友<sup>76</sup>。

姚瑩在逐一書寫故舊知交の患難相挺時，更記憶起保臺戰役の官民同心協力，以及臺灣人在獄起時の隆情厚誼，其七云：

<sup>74</sup> 《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海秋詩集》卷六，冊 1529，頁 416-417。

<sup>75</sup> 「忼慨」二字，指壯士不得志於心而依然信守不渝，結合個人生命特質與現實層面，所煥發出一種不甘捨棄而終究無成の激越情懷，從而展現出生命韌性與不盡哀思。筆者所撰〈文心曹植說〉（收入成功大學中文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8，頁 285-333）一文，曾就此意加以申論，此不贅言。

<sup>76</sup> 何子貞在這次の聚會中，有〈題宋人九老圖〉詩（癸卯）：「巾拂歸來帶御香，高懷同寄水雲鄉。自標韻事詩隨畫，妙踵流風宋溯唐。觀弈乍知塵境隔，簪花偏愛老人狂。古情可許迢遙接，九客尋秋萬柳堂。今年重陽前日，余與姚石甫、梅伯言、馬湘帆、陳頌南、蘇賡堂、朱伯韓、湯海秋、王少鶴共九人，集於萬柳堂，俱有吟詠，漫附及之。」讀之想見其爲人，故附記於此。詩見何紹基著，龍鎮球點校《何紹基詩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92.3），頁 174。

夢魂何日忘樓船，直北傳烽幸熄煙。犴狴未周三五夜（自註：「余以八月十三日入獄，二十五日蒙恩赦出。」），金雞已放九重天。微勞豈意蒙恩詔，絕島猶聞急贈錢（自註：「臺灣人士聞余入獄，醵金寄助。」）帝德民情有如此，幾回搔首馬難前。（頁 83）

姚瑩所念茲在茲的臺灣島危機，在盡心竭力、日以繼夜的籌謀策畫下，由於因地制宜且官民一心，總算有效遏阻了英人的覬覦。而自己的冤獄，同時獲得君王的眷顧與臺灣人士的幫助，在抵京入刑部獄後的短短半個月內得到化解。就一個地方官員而言，能同時獲得主政者與百姓的信任與護惜，姚瑩是成功的。因此，冤獄之後，就私領域而言，姚瑩個人心中只有感恩與寬慰，絲毫不見憤激之情。然而，在公領域方面，對抗外夷入侵的艱辛戰役中，惟一獲得勝利的臺灣官民，卻在和議政策中被徹底抹去，除了對臺灣人民並不公平外，也嚴重影響到抵禦外侮的信念，其〈又奉逮入都上浙撫劉韻珂書〉有云：

況當日各路稟報皆稱接仗計誘，所獻夷囚、炮械、衣甲、圖書既驗屬實，復有綠營旂幟、軍衣、刀仗、浙撫營官印文、火藥、道里數冊，實係騷擾內地之兵船。其時夷焰方張，蹂躪數省，荼毒我民人、戕害我大將，朝廷屢有「專征」之命，閩外曾無告捷之師；宵旰憂勤，忠良切齒。郡中得破舟擒夷之報，咸額手稱慶；謂「海若效靈，助我文武士民殲茲醜類！亟當飛章入告，上慰九重焦憤之懷，且以張我三軍、挫夷銳氣」。（頁 90-91）

所有從夷船上取得的證據，都顯示英船的戰鬥能力，以及騷擾內地所造成的傷害，卻仍然有江、浙、閩、粵四省大吏的奏請查辦，朝廷上更有耆英與穆彰阿的主導，而閩浙總督怡良更以「實無兵勇接仗之事」奏聞，以致於構陷成獄。在姚瑩看來，臺灣的勝利意謂著外夷的船堅炮利並非不可抵擋，除了實際作戰的經驗可資借鑑外，更可激勵三軍士氣。可惜冤獄既成，戰勝外夷的契機因而中斷，國家的局勢自然令人憂慮，因此最後姚瑩寫下：

相知新舊別如何，擊筑當筵共放歌。月地怒聞金石裂，霜天哀感雁鴻多。分無寶劍酬燕士，那更悲風渡塞駝。班馬蕭蕭從此去，暮雲迢遞阻渾河。（頁 83-84）

這一群因姚瑩出獄而聚會的朋友，透過姚瑩的敘述，更清楚體會到臺灣之獄的形成，使得抵禦外侮的努力完全落空，這已不僅是姚瑩個人的榮辱問題，而是關係到國家的盛衰存亡。因此姚瑩的冤獄雖然獲得昭雪，對國家安危的憂慮，使欣喜之情瞬息間就轉變為慷慨悲歌。詩中更將這次的宴聚比喻成荆軻刺秦的易水宴，悲歌慷慨與霜月哀鴻交織成壯烈情懷。遺憾的是，兵臨城下危如當年的燕國，自己雖有殺身報國的決心，可惜無法得到殺人立死的寶劍，以致於「蕭蕭班馬鳴」的離情別緒，取代了「蕭蕭易水寒」的慷慨羽聲<sup>77</sup>，徒令邊域瀰漫成一片撥不開的雲霧。很顯然地，對於主政者沒有抵抗外敵的決心與作為，姚瑩是有微辭的。

### （三）由官民命運共同體到臺灣觀點的浮現

出獄之後的姚瑩，以同知知州發四川用，兩度奉使西藏，其地去成都三千六百餘里，往返萬里，冰山雪窖，崎嶇備至，而姚瑩處之恬如，所至詳考其地方、道里、遠近、山川、風俗，於西洋各國情事及諸教源流，尤深致意，寫成《康輜紀行》十五卷，附中外四海地形圖說一卷<sup>78</sup>。卻因不得長官信任，無法施展其經濟長才，因而著書立說就取代了實務作為，而臺灣時期的官民互動關係，也就益發顯得難能而可貴。因此當道光二十六年姚瑩以制府奏議奉使西藏不力而調任蓬州時，忍不住記憶起臺灣事而寫下一詩，題長如序，云：

癸卯（1843）在臺灣就逮，諸生有禱天后者，得讖云：「制虎降龍靜煉丹，

<sup>77</sup> 荆軻事見新校本《史記》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第四〉：「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頁 1561）又卷八十六〈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荆軻〉：「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遺荆卿。」（頁 2533）及行，「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頁 2534）（臺北：鼎文書局，1984）至於「蕭蕭班馬鳴」則出自李白〈送友人〉。

<sup>78</sup> 詳見《姚瑩年譜》。姚瑩的奉使是為了解兩呼圖克圖相爭之事，《康輜紀行·自敘》云：「康輜紀行者，道光甲辰、乙巳、丙午間，瑩至蜀中，再奉使乍雅、察木多撫諭蕃僧而作也。」並解釋呼圖克圖乃「大蕃僧歷轉世間不連本性之稱呼」（頁 3），即今日所稱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



從今縱躍出元關。前途一片風光好，不到蓬萊只等閒。」疑或不死。而至登州及來蓬州，乃知其應昔東坡出獄謫黃州，四年至登州，有海市詩。余往來渡海者六，由今思之，何殊海市耶？坡公至登州年始五十，余今六十二矣，然公六十二歲尚有僂耳之謫，余幸不已多乎。（頁84）

從詩題來看，經歷過臺灣之獄與出獄後的宦海浮沈，姚瑩更能夠體會到當年與臺灣群眾所建立的命運共同體關係，諸生急姚瑩之急而求取天后宮籤詩，已然映現休戚與共的伙伴情誼，而籤詩內容所兆示的「苦而得甘，不負所志」<sup>79</sup>，更給了臺灣人民與姚瑩無限的希望。出獄後的調派四川到奉使西藏，走的是與臺灣背道而馳的道路，個人際遇與臺灣局勢同樣是陷入困境。因此調任蓬州雖是貶謫，對姚瑩而言，親近海洋有如重回臺灣一般的親切，更何況還有籤詩的應驗，預設了「不負所志」的可能，因而由潮汕的蓬州連結到蘇軾的登州經驗，蘇軾有〈登州海市〉詩云：

東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水冷天地閉，為我起蜚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為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伸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鳥沒，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sup>80</sup>

海市蜃樓的美麗幻景，所映現的異事異物異聞，都不是走向京城的蘇軾所曾目睹，因而使蘇軾體認到「信我人厄非天窮」，因而開啓了更寬闊的視野：在大自然面前的人類是渺小而無常的，因為貶謫而有機會見識到更多大自然的奧妙，相形之下人的情感悲喜與語言構設，就顯得渺小而失去了表述的意義。歷來中國文人的海洋經驗本就極為欠缺，蘇詩中所提到的韓愈，表現出對海洋的畏惡與對山峰的虔敬<sup>81</sup>，

<sup>79</sup> 今日天后宮尚存此籤詩，內文如下：「制虎降龍靜煉丹，從今縱躍出玄關，前途一片風光好，不到蓬萊只等閒。」解文：「苦而得甘，不負所志。」

<sup>80</sup> 見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臺北：明道書局，1990.10），頁1387-1389。

<sup>81</sup> 韓愈貶潮州，有〈鱷魚文〉，首先揭示先王驅蟲蛇惡物而出之四海之外，後王不能遠有，乃棄江漢之間以與蠻夷楚越，而今天子神聖慈武，因此韓愈要鱷魚「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可見韓愈認定海洋是容納惡物的棄地。而其〈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一開始就指出「五嶽祭秩皆三公」的地位，因此韓愈以「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肯定山嶽有靈，一掃陰霾見晴

可見一斑。到了蘇軾，已能珍惜海上奇景所帶來的視覺饗宴；相形之下，姚瑩的六次渡海經驗，就人與海洋的關係來說應屬大幅度的突破，惟若就人事變化而言，竟如蘇軾海市詩所言一般隨風變滅。在事過境遷的感慨中，姚瑩對於六十二歲的再一度面對海洋，比起蘇軾六十二歲還渡海到儋耳，在體力的挑戰上還比較容易些，藉此自我寬慰，也可見其詩人情性。其詩云：

人馬珍奇幻蜃樓，此生常擬到登州。蓬山便是蓬萊閣，海市當年已漫遊。（頁84）

在事後的追憶中，姚瑩意識到自己對海上世界的憧憬，應是閱讀蘇詩所受到的感召，開啓了自己一再渡海赴臺的契機，並且與臺灣結下了生死與共的深緣，也一直守著諸生／天后／籤詩中「不負所志」的約定。經過入獄、出獄、入川、出使西藏的諸多風風雨雨，而今來到海邊，再度記憶起蘇詩，把汕潮的蓬山與登州的蓬萊閣加以重疊，則臺灣即是當年蘇軾所遙望興歎的海市，恍然大悟的姚瑩，終於意識到：原來自己曾經是被內地所觀看的海市中人，而自己曾殫精竭力、刻苦營謀的臺灣經歷，也正如海市一般隨風變滅，再也無從追尋了。

姚瑩在蓬州著有政績，卸任後應李星沅召赴金陵，為陸建瀛編《海運紀略》後編二卷，紀道光二十八年海運事，凡此可見姚瑩的親近海洋且嫻熟海事。道光三十年，新君即位，穆彰阿、耆英以罪免，硃諭中有云：「如達洪阿、姚瑩前在臺灣盡忠盡力，必欲陷之，天下益知臺灣之事由於大臣，非先帝意矣。」<sup>82</sup>把臺灣之獄歸咎於大臣，為君王決策的反覆開脫，雖然還姚瑩一個公道，卻無補於國事日衰及姚瑩的年老體衰。因此，當姚瑩因老病乞歸而不得不遣退隨身僕人戴崑時，記憶的仍是臺灣事，其〈遣僕〉詩有序云：

空，目睹五峰聳立：「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衡山有五峰，紫蓋、天柱、石廩、祝融、芙蓉）。」因而「森然魄動下馬拜」，展開虔敬的謁拜活動。詳見《韓昌黎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3），《文集》頁329、《詩集》頁128。

<sup>82</sup> 引自《姚瑩年譜》。《清朝柔遠記選錄》〈咸豐元年〉也記載：「初，上在潛邸，即深知達洪阿、姚瑩之冤。至是，詔告天下，有曰：『當時政府力排異己，如達洪阿、姚瑩之盡忠盡力，有礙於己，必欲陷之』。於是臺灣之獄大白，姚瑩等尋起用。」收入臺灣文獻叢刊一二六，頁31。

奴子戴崑，從余於臺灣，親見余數平南北路之亂，及英夷犯臺，籌防十七海口，擒斬黑白諸夷事。後被逮，復從北上，入刑部獄。返桐城，入蜀，奉使乍雅，至察木多，險阻患難無貳心。在蓬州休息未二年，而余乞病歸，不能養之矣，乃託之於胡觀察。將行，出箠乞書。余不能書，崑所知也。崑曰：冀異時見手蹟如見顏色耳。感其意，書而予之。崑無便捷材，而忠謹可取，為詩遣之。（頁 85）

戴崑以隨身僕人的身分，親身參與了姚瑩在臺灣的事蹟，從平息內亂、收服民心，到官民同心協力、擊退英船，可謂無役不與；也陪同姚瑩深刻感受到由褒揚有加到被逮入獄以至出獄放還，人情冷暖全在心頭；當姚瑩入蜀兩度奉使西藏時，往返萬餘里的冰山雪窟，依然是戴崑陪著走過險阻的旅途。當姚瑩在蓬州時，建玉環書院，息爭訟，使胥吏無法因訟為利而紛紛乞退，及卸州事，蓬人為立位仁廉祠，喧闐走送。時川北道胡恕堂觀察（興仁）以事過蓬，見而嗟歎曰：「君可謂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矣。」<sup>83</sup>此時姚瑩已萌退意，乃把忠謹的戴崑託付給胡興仁，並且寫下五古長詩，一開始就針對一般官員的家人僚屬加以剖析：

仕宦誰最懂，家人及奴婢。豈惟飽暖求，亦有輕肥喜。

在封建時代，男性是家中經濟主要來源，而士人的工作選擇權並不大，比起塾師的教職工作或幕僚的祕書工作，「仕宦」成了改善家中經濟的最好出路<sup>84</sup>。連帶的「奴婢」也沾光，如蓬州胥吏的藉買賣訴訟案而牟利。姚瑩既然革除了蓬州的弊端，他的仕宦生涯自然也絕無薪俸之外的利可圖，因此對於跟了自己的戴崑，自有一份患難與共的疼惜：

爾崑亦胡為，相從乃異是。家本滄海東，生無便捷技。從余困鞍馬，親見軍中事。南北討亂民，防夷築烽壘。海氛幾年靖，幸未亡一矢。扶病治軍書，中夜輒數起。兇夷既受縛，敲觶若羊豕。海外全境完，大吏或怒視。時事局

<sup>83</sup> 見《姚瑩年譜》，頁 256。

<sup>84</sup> 以姚瑩家族而言，在祖父輩還是「薄田粗給，未嘗析爨」，兄弟五人分別為舉人、貢生、邑庠生，時任廣西南寧府同知的二伯祖負擔主要的家族經濟，還有能力買宅。「及南甯君卒於署府任」，又「數遭喪娶」，家道遂告中落，典賣舊宅畚田之餘，姚瑩母親張太宜人更是「悉遣僕婦，自臨炊汲；素不任操作，十指皆流血」，而姚瑩兄弟的求學之路更是倍極坎坷。詳見《姚瑩年譜》所錄〈痛定錄〉。

已成，孤臣志則已。喘息曾未蘇，輦帶遂三褫。檻車實顛沛，囚服敢言恥。  
獄成幸免戍，入蜀更奉使。

姚瑩在敘寫主僕情誼的長詩中，藉由異於一般奴僕的戴崑，做為記憶臺灣之事的歷史見證人，除了戴崑的「無便捷伎」、「忠謹可取」的個性，還在於戴崑「親見軍中事」，對於姚瑩的挑燈籌謀、黽勉從公，乃至諸多戰守措施與生殺裁奪，應是歷歷在眼的。序中姚瑩主動提到最受爭議的「擒斬黑白諸夷事」，在序與詩中都確立在保護臺灣安全的主調上。如前引姚瑩文書所見，臺灣孤懸海上，內地的支援既屬微薄，又因海洋的風浪而有很大的變數，再加上渡海來臺人士的多元紛雜，本就呈現不穩定狀態，更何況英法等國的強力拓展海外勢力，幾乎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想要取得貿易據點，這些都使臺灣由歷史的邊陲位置，捲入國際紛爭而成爲風暴的核心。意識到這一點，姚瑩首先以平息內亂來維繫臺灣的穩定性，才能官民一心全力抵禦外敵，姚瑩非常清楚：臺灣必須以自己的力量來確保自己的安全。在苦心籌劃與官民同心協力下，姚瑩也很驕傲地指出：「海氛幾年靖，幸未亡一矢」，臺灣即使面對外夷的船堅炮利，依然具有自我防衛的能力，甚至使一再騷擾內地沿海而大獲全勝的凶夷，在臺灣成了階下囚。而「擒斬黑白諸夷事」的係爭點，就在臺灣觀點與內地觀點的差異：「海外全境完，大吏或怒視」，孤懸海外的臺灣島的安全保障與重要性，在內地大吏的眼中，畢竟比不上大陸沿海的安寧與自己的政治前途。這樣的覺知，使姚瑩在處理上極費心力，如前引〈與梅伯言書〉所云：

夷人大局，一誤再誤，人所共知，某則以為畏葸者固非，而輕敵者亦未為是。忠於謀國者，總當無立功好名之心，審量事勢機宜，善權終始，豈一言所能概耶？某職在守土，惟知守土而已，不敢他及也。

地方官員職在守土，面對強敵虎視，既不能示弱也不能輕敵，更不可有貪功好名之心，所有的隨機應變，都必須扣住「守土」這個前提，以臺灣安全作為優先考量。姚瑩在〈籌辦堵勦議〉中奏稱監禁的一百六十餘名夷囚，「解省既有不可，久禁亦非善計」，而路途遙遠，奏請又遲未回覆，「倘大幫猝至，惟有先行正法以除內患」，報可。因此，當泉州沈守兩次來函，以舟山、廈門失守為夷人報復之證，姚瑩於〈上

閩督論斬夷囚書〉中直言：「試思夷初至舟山，非有所仇也；近至上海，又豈有仇乎？」且就臺灣立場而言，「惟當安撫人心，益修守備，嚴拏姦民，盡心力而無懈耳。兩軍對仗，勢必交鋒；非我殺賊，即賊殺我！乃先存畏彼報復之見，何以鼓厲士卒乎？」<sup>85</sup>面對夷人的強勢作為與內地大吏的自保心態，姚瑩對於如何確保臺灣安全與激勵士卒心情，可謂煞費苦心。因此才會在姚瑩被傳旨逮問時，有「人持香一炷赴愬行營」、「續據全臺士民遠近奔赴，合詞申理」的全民擁戴的情勢出現<sup>86</sup>。姚瑩對於「臺灣正法之夷人，皆係遭風夷商，不應正法」的情勢逆轉，有〈夷酋忽生異議奏〉作詳實的辯解，云：

該夷船來臺游奕，在未起颱風之先，及到雞籠洋面停泊，已在風息之後，且先泊外洋，後進口門，中歷三日之久，何得謂之遭風？如係商船，為何開炮攻我炮臺？所有取獲大小炮多門及夷人戰甲尚在可證。及九月初五日，又有三桅夷船至雞籠攻我炮臺石壁，燒我哨船一隻，因上岸夷人為我兵炮斃，始行退去。似此攻戰交鋒，何竟隱匿不言？而以遭風藉口。……起獲炮械，內多浙江寧波鎮海營中軍器，鑄有各營字號，併有起獲浙江提督水師號衣二件、綠色旗幟二面、署溫州鎮左營守備所造本汛水陸程途里數山形水勢冊一本、浙江巡撫札溫州左營包游擊捕盜印文二件、又札包游擊查獲販買鴉片之閩犯陳往印文二件、穎州營左軍葛守備札薛外委查守兵陳廷儉有無飲酒生事印文一件，現俱貯庫可驗。若係商船何有此物？顯係在浙江騷擾之兵船，毫無疑義。……且事在和義未定以前，薄海同仇，即使夷船實係遭風，亦當乘勢攻擊，方為不失兵機。豈有釋而不擊、捨而不殺之理？況夷人夾板雖多，其中多係派用商船，打仗勝則稱為兵船，以耀其武，敗則指為商船，以諱其短。此固兵家之常，原無足怪。乃於和議已成之後，追尋前事，謂臺灣不當以其人正法，成何理耶？<sup>87</sup>

以如此明確的事證與物證，依然無法抗拒中央與內地大員的勢力，為了護持臺灣民眾的忠義之心，姚瑩甚至決定一肩挑起斬夷囚的是非，其〈又奉逮入都上浙撫劉韻

<sup>85</sup> 詳見《東溟文後集》卷七〈覆怡制軍言夷事書〉，頁 139。

<sup>86</sup> 詳見夏燮《臺灣之獄》，收錄於《臺灣關係文獻集零》之十一，頁 83-88。

<sup>87</sup> 詳見《東溟奏稿》卷四，頁 174-176。

珂書〉云：

某與鎮軍熟計，夷人彊梁反覆，今一切已權宜區處；膚愆之詞，非口舌所能折服。鎮、道不去而夷或至，必不能聽其所為；夷或別有要求，又煩聖廡：大局誠不可不顧也。且愆出夷人，若以為誣，夷必不肯服；鎮、道天朝大臣，不能與夷對質辱國。諸文武即不以為功，豈可更使獲咎，失忠義之心；唯有鎮、道引咎而已。蓋未撫以前，道在揚威厲士；既撫以後，道在息事安民。鎮、道受恩深重，事有乖違，無所逃罪；理則然也。（頁 91）

身為政治體制中的一位官員，大局如此，固然不能不委曲求全；對臺灣人民而言，姚瑩更在意的是「即不以為功，豈可更使獲咎」，這種功／過乃至是／非的全盤翻轉，對臺灣人民是極不公平且難以理解的。「認罪」乃成了姚瑩護持臺灣人民忠義之心的惟一選擇，以一身擔起是非而可以「息事安民」，對姚瑩而言是求仁得仁<sup>88</sup>。可惜姚瑩的罪己並不能有效保住臺灣民眾的地位，夏燮在〈臺灣之獄〉中即直言論斷：

若臺灣兩次戰功，皆有奏報之確據；徒以斬戮夷囚，遂生事後波瀾。在該夷諱敗誇強，曾何足責！而怡督昔撫粵東，不附和議；一旦升任閩浙，懲廈門之前車，茶然自喪其生平而不顧，袒夷抑民，因而歸其罪於官。在鎮、道過則歸己，固臣子之本分；乃至並當日保奏議敘之官紳一概撤銷，亦已過矣！

89

就斬夷囚事件而言，中、英立場本就不同，荒謬的是身為閩浙總督的怡良，不但自毀立場做出「袒夷抑民」的事，更把當日保奏議敘的官紳一概撤銷，難怪夏燮要點名嚴詞批判了。因此，姚瑩忍不住藉詩吟出「時事局已成，孤臣志則已」，把自己視為無力抗拒時局的「孤臣」，不但所有的苦心孤詣盡付東流，還飽嚙檻車囚服的苦楚與恥辱，同時也結束了自己與臺灣民眾的這一段官民情緣，各自走向坎坷的未來。而見證過臺灣事的戴崑，也成了惟一跟隨在身邊的忠實伙伴：

<sup>88</sup> 姚瑩在《東溟文後集》卷七〈奉逮入都別劉中丞書〉中質疑「怡督憲渡臺逮問鎮道，成算早定。」（頁 147）並自明心志云：「夫世俗紛紛，皆由功名富貴之念重，則君臣道義之念輕耳。吾胸無俗見，不特進退坦然，苟利社稷，即身家在所不計。古有殺身成仁、毀家舒難者，彼何人哉？」（頁 149）

<sup>89</sup> 詳見《臺灣之獄》，頁 83-88。

冰山與雪窖，負痛入骨髓。已覺脛無毛，數見呼庚癸。惟爾實相從，艱難僅不死。前後幾十年，辛勤未一弛。旦夕遭呵罵，或未免鞭箠。面無色怨嗟，背亦無訾毀。貴賤常異交，安危不同理。翟公門上書，今古慨同軌。惟爾以拙誠，一意相終始。我髮已全白，爾歲未三紀。蓬州始安居，酬賞尚有俟。病罷我則歸，養養今已矣。負爾非一端，患難徒相倚。爾望本不奢，聊以勸義士。相知有胡公，清峻善臧否。許爾入廡下，安寘及妻子。勉事新主人，貞勤當自矢。長言述爾事，歲月易流駛。百年會有盡，臣僕咸視此。（頁 85）

不同於詩一開始所指稱的仕宦人家奴婢，做為姚瑩的奴僕，戴崑不但撈不到好處，在長達幾十年的主僕關係中，還共同承擔了數不盡的辛勤與種種艱難，姚瑩忍不住省察起自己的嚴苛，也更珍重戴崑的人格特質與主僕情誼。因此在前詩體悟到臺灣事已如海市般隨風變滅時，姚瑩決定給仍屬盛壯之年的戴崑一個機會，把戴崑託付給有知人之明的胡興仁，相信會有另一番的成就。此後，姚瑩雖在咸豐元年（1851）調任廣西按察使，參與鎮壓太平天國軍，可惜言論方略多受牽制而不見用。兵敗後隨軍至湖南並擔任按察使，終因抑鬱不得志而結束憂憤的一生。

就姚瑩一生而言，身處列強入侵、國家危急之際，真能舍身家性命於度外，得兵民心，使臺灣成為道光帝的惟一慰藉<sup>90</sup>。大獄初起，姚瑩深知「舉世獲罪，獨臺灣屢邀上賞，已犯獨醒之戒；鎮道受賞，督撫無功，又有以小加大之嫌。」因而已有「追林、鄧二公相聚西域，亦不寂寞，或可乘暇讀書，補身心未了之事，豈不美哉！」<sup>91</sup>的心裡準備。就臺灣之獄而言，姚瑩無愧無悔，因而在有關臺灣之獄的詩人書寫中，能夠映現出如光風霽月般的坦然襟懷。然而「大局已壞」，國事終究無成，臺灣之獄以後的經歷，如〈遣僕〉後半所見，放棄與戴崑的主僕關係，即意謂著詩人已放棄對有所作為的期待，又如何能無怨？而怨與不怨間，正是詩人書寫的精妙處。

<sup>90</sup> 姚永樸《舊聞隨筆》卷四記載南京和議成，英人開始追究臺灣事，宣宗感歎地說：「豈我國不能有一勝仗耶？」引自施立業《姚瑩年譜》頁 277。

<sup>91</sup> 詳見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四月）姚瑩〈再與方植之書〉，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八三《中復堂選集目錄》《東溟文後集卷》八，頁 151。

## 四、結語

在漫長的封建集權時代，士人入仕本就要面對君威難測與權力紛爭；做為一個偏遠地區的地方官員，很容易在政策考量中被忽略，尤其當中央與地方的視點有所差異或衝突時，更難有所作為，即使有所作為也通常會在政策搖擺中被犧牲掉，以致於個人的功／過、毀／譽乃成為浮動的游標。做為地方官員，姚瑩主動尋求對域外的了解，把視域由中土擴展到更遼闊的世界舞臺，掌握到近代西方國家全力拓展海外市場的動向，使臺灣島由化外棄地變成野心家的必爭之地。姚瑩為臺灣所作的種種規畫與策略，都清楚標示出海洋空間與島嶼特性；姚瑩以臺灣立場所提出的視野，多少會動搖到以中原為核心的思考角度，但是並未能改變臺灣終究是邊陲的實況。即便如此，臺灣依然在姚瑩的苦心擘畫與士民的通力合作下，從前哨／堡壘二元對立的宿命中掙脫，首度憑藉著自己的力量在歷史扉頁寫下「臺灣」兩字。

無可否認的，當姚瑩任職臺灣時，他只能算是一個有理念而盡責的地方官員；但是當他歷經臺灣之獄以後，又先後擔任了其他地區的地方官員，在相互對照下更顯得臺灣經驗的獨具意義，因而在不同階段、不同情境的詩歌書寫中，不自覺卻又有其延續性地流露出以臺灣為主體的思考向度，由此所逐步浮現的「臺灣觀點」，雖未能給予有效引導而蔚為風潮，若就當時歷史背景下所萌發的先覺性而言，對於以後設角度所建構的「臺灣觀點」，仍然是彌足珍貴的。總結本文提出如下見解：

- 一、姚瑩宦臺期間長達十餘年，對於臺灣人民生活習性有深刻分析，更清楚意識到內地的奧援既不可能也不可靠，乃建立以「本土」為核心的思考模式，破除臺人「難治」的慣性思維，瞭解／欣賞臺人的膽氣與習武風尚，把捍衛個人生存的努力引導向「自衛鄉邦」的鄉土情感，使官民形成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體。
- 二、在行政區域的劃分上，臺灣僅屬於福建省的一府；上級長官與中央政策在前、後議之間的轉折，純是主政者的便宜措施，並不了解姚瑩與臺灣士民間的互信機制。臺灣之獄的造成，使姚瑩凝聚人心、因地制宜所建構的臺海防衛功能，失掉了持續運轉的機制，更扼殺了臺灣自主性的生存空間，是姚瑩與臺灣人共



- 同的悲痛與無奈。
- 三、姚瑩論詩，歸於《風》、《騷》傳統所體現的「興觀旨」，提出詩不可苟作的主張，強調詩歌必須要有真情實感，以一腔熱血超越個人的身家名利，感激忠義，深切體會到他人的是非得失，關心天下國家大事。檢視姚瑩有關臺灣之獄的書寫，入獄前採用古文體，據事論理，慷慨深切，是可傳世的應用文書；入獄及出獄後則選擇以詩體寫作，情真辭婉，讀之可得興觀之旨。
- 四、面對攸關名節生死的大獄，姚瑩詩中完全沒有表現出驚懼、爭辯、焦慮、怨對乃至忿恨的不平之鳴，甚至對「風吹青麥隴」的清明春景，與「一窗好明月」的中秋夜景，都有著當下的沈迷，若非襟懷坦蕩，孰能如此。對於事件的最後裁決者——位居九重之上的君王，姚瑩相信／期待他能夠在紛雜的訊息中作出明智的判斷，心存忠義也使詩在深厚婉摯中自有一股坦然之氣。
- 五、姚瑩對於自己入獄所激起的不分朝野、不分性別的回響，喚起了群眾對時事的關心，凝聚成一股龐大的輿論壓力，當時的言論必然觸及到若干平常屬於禁忌的議題。這樣的發展，是以「一個官員／詩人姚瑩入獄」而發生，因此，在刑部獄十三天即獲得釋放，姚瑩認為是君王體會到群眾的心聲，而「臺灣之獄」也就不再囿限於姚瑩的個人榮辱，而是關涉到國家的盛衰存亡。
- 六、對於臺灣之獄所關涉的公／私領域，姚瑩以連章詩的方式，寫下患難真情、個人榮辱與國家安危三者之間的交攝叢結。姚瑩在逐一書寫故舊知交的患難相挺時，更記憶起保臺戰役的官民同心協力，以及臺灣人在獄起時的隆情厚誼。因此，冤獄之後，就私領域而言，姚瑩心中只有感恩與寬慰。在公領域方面，臺灣官民對抗外夷入侵的艱辛與成就，卻在和議政策中被澈底抹去，除了對臺灣人民不公平外，也使得抵禦外侮的努力完全落空，就此而言，姚瑩對主政者沒有抵抗外敵的決心與作為，是有微辭的。
- 七、歷來中國文人的海洋經驗本就極為欠缺，韓愈明顯存在著對海洋的畏惡與對山峰的虔敬，蘇軾已能珍惜海上奇景所帶來的視覺饗宴，姚瑩的六次渡海經驗，對人與海洋的關係來說是大幅度的突破。在臺灣之獄後的追憶中，姚瑩意識到

自己對海上世界的憧憬，應是閱讀蘇詩所受到的感召，開啓了自己一再渡海赴臺的契機，並且與臺灣結下了生死與共的深緣，也一直守著諸生／天后／籤詩中「不負所志」的約定。

八、當姚瑩因老病乞歸時，選擇以奴僕戴崑做爲臺灣之事的歷史見證人，並且主動提到最受爭議的「擒斬黑白諸夷事」，把事件定位在保護臺灣島安全的主調上，明確指出係爭點就在臺灣觀點與內地觀點的差異：孤懸海外的臺灣島的安全保障與重要性，在內地大吏的眼中，畢竟比不上大陸沿海的安寧與自己的政治前途。這樣的覺知，使姚瑩爲了護持臺灣民眾的忠義之心，決定一肩挑起斬夷囚的是非。可惜姚瑩的罪己並不能有效保住臺灣民眾的地位，因此，身在清朝，姚瑩仍忍不住把自己視爲無力回天的「孤臣」。

九、經歷過臺灣之獄，姚瑩更能夠體會到當年與臺灣群眾所建立的命運共同體關係。也許是「曾經滄海難爲水」，出獄後的宦海浮沈，走的是與臺灣背道而馳的道路。因此，當他再度來到靠海的蓬州時，終於意識到：原來自己曾經是被內地所觀看的海市中人，而自己曾殫精竭力、刻苦營謀的臺灣經歷，也正如海市一般隨風變滅，只成了歷史記憶中的一個幻影。

十、依姚瑩詩序，臺灣之獄發生後的「中外作詩著論」者宜有臺灣本土的聲音，何況與姚瑩同時的臺灣本土詩人有鄭用錫、林占梅、施瓊芳等，寓臺詩人也有熊一本、曹謹、林樹梅、施鈺等，惟初步檢索並未發現與臺灣之獄有關的詩作，無法探知當時本土／寓臺詩人的反應，使得姚瑩爲臺入獄詩的書寫僅成個人的生命體會，而姚瑩的「臺灣觀點」也就未能反饋臺灣、發揮歷史性的意義，殊爲可惜。